2935

歷史教學

6
Copy___
9560 H
3 APR 1952

特大

Vol. 3, no. 1, 1952

第三卷
第一期
(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出版)

關於上層建築變革規律的商討 葛懋春
「一·二八」上海抗戰簡記 傅彬甫
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 蔡美彪
日本戰敗後初期的勞工運動史 陳信德譯
太平天國常熟守將錢桂仁發田并憑跋 周穗成
人民歷史教師對教育的基本認識 何遠
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的教學研究 秦和鳴等

·歷史教學月刊社出版·新華書店天津分店發行·

目錄

關於上層建築變革規律的商討……葛懋春（一）
「一二八」上海抗戰簡紀……傅彬甫（四）
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蔡美彪（七）
譯文 日本戰敗後初期的勞工運動史……陳信德譯（十）
豫西考古紀略……安志敏（一三）
南昌教案……來新夏（一六）
太平天國常熟守將錢桂仁發田憑幷跋……周穗成（一九）
問題解答兩則……（二二）
人民歷史教師對教育的基本認識……何遠（二三）
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史」的教學研究……綦和鳴等（二六）
記錄講課 第一次中日戰爭（續完）……司綏延（三一）
史料拾零……陳毓羆（三五）
編後記……（封底）
封面銅版（太平天國田憑圖片參閱一九頁）

歷史教學
•月 刊•
第三卷
第一期
通卷第十三號
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歷史教學月刊社編委會
出版者 歷史教學月刊社
發行者 新華書店天津分店
天津羅斯福路
各地新華書店均可訂閱
印刷者 知識印刷廠

歷史教學訂閱辦法

1 本刊訂爲月刊，每月一日出版，實價二千八百元。
2 本刊三月三期實價八千四百元，半年六期實價一萬六千八百元，全年十二期實價三萬三千六百元。
3 本刊零售價格變動或特大號加價時原訂戶不受價格漲落影響。
4 訂閱本刊平寄郵費免收，掛號每期另加掛號費。
5 郵寄刊物的中途遺失，若爲掛號寄遞，本店負代查之責。
6 訂戶由本店經常供給圖書目錄。

關於上層建築變革規律的商討

葛懋春

自從斯大林新近重要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一書介紹到國內以後，已普遍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大家並在刊物上展開討論，交流學習經驗，這是可喜的現象，而今後似乎更必要有組織地深入地將討論展開下去。「歷史教學」月刊結合讀者學習要求，曾陸續的刊登了「斯大林對史學新指導」（一卷四期，趙儷生作），「細密地學習上層建築和基礎的關係問題」（二卷二期，趙宗復作）和「再論建築與基礎並答趙宗復先生」（同上期，趙儷生作）。在最後兩文中，大家討論都是圍繞上層建築改變規律這一中心論題的。趙宗復先生批評了並爲趙儷生先生所誠懇接受了的是：趙儷生先生錯誤地認爲「上層建築隨基礎的改變而改變的不迅速性」，同時趙儷生先生在其答文中指出馬克思所論上層建築改變的「或遲或速」的規律「究竟是最全面的眞理」，並且結合歷史事實論證了這一規律。

關於上層建築改變的「或遲或速」規律，是客觀的眞理，誰也不能否認。但對趙儷生先生解釋這眞理之所以爲眞理的原因上，作者却有不同的看法，特此提出幾點不成熟的粗淺意見，敬希趙先生和讀者指正。

× × ×

趙儷生先生在答覆趙宗復先生批評一文中，曾提出兩個問題：「（一）在過去的歷史上（主要是階級社會的歷史上），每當基礎改變之時，作爲上層建築的觀點與制度體系往往改變得快呢還是慢？（二）在打破階級制度或基本上打破階級制度的革命以後，作爲眞正革命的政權與文化，對舊的觀點與制度體系又往往是採取峻急消滅抑或慢慢改造的措施呢？」接着作者回答道：過去階級社會歷史上的上層建築在同一種條件下，其改變不是一致的，有「迅速的改變」，有「不迅速的改變」。爲什麼各種上層建築之間的改變規律，表現不一致呢？據趙先生考慮，「（一）是由於這某種觀點、制度和體系之固有的頑固性，（二）是由於在階級社會階段中新基礎中新統治階級及其政策之有意保留」（點子是筆者添加的）而造成了某些上層建築改變之「不迅速性」。至於某些上層建築的改變爲什麼有「迅速性」，趙先生未作正面答覆。只舉出無產階級革命或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後，對某些上層建築如政權、軍隊、報紙、法律是迅速改變的，原因在於「它是可能而且是必需的」。那些舊的風俗習慣，則「不一定要峻急改革」，因爲「如操之過急，反會欲速反遲的」，也就是說迅速改變風俗習慣在目前說是不必需也是不可能的。至於這些和那些上層建築的迅速改變之不可能和不必需，可能和必需的原因，趙先生未明確指出。但聯系前文對某些上層建築改變的「不迅速性」之兩個原因的說明來看，他顯然是以爲，上層建築迅速改變之可能與不可能，必需與不必需，乃決定於它們的「固有頑固性」和新統治階級對它們的「有意保留」與否。

對於作者所提出的問題與解答，假如我們沒有理解錯的話，那麼我們覺得這種解答沒有觸及問題的核心，有繼續深入討論的必要。

× × ×

趙先生提出上層建築有「或遲或速的大變革」是正確的，但他却錯誤地理解了其所以正確的原因。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趙先生所謂的「固有頑固性」吧！他說，某一種上層建築由於它自己「頑固」的特性，才規定了它本身不能够被迅速改變；反過來說，有些上層建築其所以能够迅速改變，也是由於它本身特性中的非頑固性。因而這也就是說，上層建築本身的內在特性中的頑固性與非頑固性，是決定上層建築改變的迅速或不迅速的動因；上層建築變動的規律是受其本身內在性質決定的。

這樣，作者以上層建築自身來解釋它自身的發展，忘記了歷史唯物論者時時應該把握的原則：物質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大家知道，上層建築是隨着基礎的產生而產生，隨着基礎的消滅而消滅；上層建築是經過「經濟的中介、基礎的中介與生產發生間接的聯系」，並「通過在生產中的各種改變折光，通過在基礎中的各種改變」去反映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改變（註一）；「每一種經濟基礎與竪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都是由一定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一定的生產發展水平所產生的」（註二）。既然這樣，上層建築本身就不能解釋其自身的發展，而必需從生產力發展水平、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係

性上加以解決，其原因是上層建築的運動規律不可能脫離前兩者決定性的影響。只有唯心論者把上層建築和它據以存在的基礎及生產力發展水平機械地割裂開來，認爲它自己的特性可以決定它自己運動的規律。馬列主義者相反，在研究上層建築的改變規律時，是從上層建築和它據以產生的、存在於它外部的物質生活條件之間的關係着眼，並考察在這些外在條件決定性的影響下所形成的各種上層建築的某些特點，對它自身發展規律的一定限度的影響。假如把這些根本上受制於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某些上層建築的某些特點，當作是決定它自己運動的唯一的、決定性的原因，那就等於把上層建築的存在、運動和發展，視爲可以超然於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基礎以外的東西。

其次，趙先生說某種上層建築改變的「不迅速性」，「是由於某種觀點、制度和體系之固有的頑固性」時，好像以爲上層建築眞具有什麼「頑固性」似的。斯大林在論上層建築的特點中沒有這樣提法。假如趙先生所謂某種上層建築的「固有頑固性」，是指舊的某種觀點、制度和體系具有一種對新基礎、新建築的頑固抵抗作用，因而阻碍着新基礎、新建築的建立和鞏固，那麼這並不能作爲某種上層建築改變的「不迅速性」的解釋。因爲，不僅舊的文學、藝術和宗教等意識形態，具有這樣的所謂「固有頑固性」；就是那些可能和必需以「或速」方式進行大變革的舊政治、法律等，也同樣具有着垂死掙扎以抵抗新事物成長的「固有頑固性」。不但革命前，先進革命階級爲了打破人們「正統」的舊的政治、法律觀點，要經過若干年去組織艱巨的政治鬥爭和理論鬥爭，而且在新基礎建立後，還要與那些阻碍新基礎、新建築成長的「正統」意識、殘存的舊的政治勢力進行不妥協的鬥爭。顯而易見，一切舊的上層建築在爲其舊基礎服務上都具有抵抗新事務成長的「頑固性」。這樣就可說明以一般上層建築都具有的所謂「頑固性」，去解釋某些上層建築所特殊具有的「或速或遲」的改變規律，是絲毫無用的。因爲，我們要解釋的是：爲什麼這個上層建築有「頑固性」，却「或速」的改變；而另一些上層建築也有「頑固性」，却「或遲」的改變。

這種認爲某種上層建築改變的「不迅速性」，是由於它「固有頑固性」的錯誤說法，在政治上的危害性，一方面就在於它可能使人想像出這樣的結論：某種舊的上層建築改變之「不迅速性」，既是它「固有的頑固性」造成的，而不是它的外在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那麼，根除舊的某種上層建築的殘餘影響，只須針對其「固有頑固性」進行改造好了。從而就否認了只有在爭取新社會物質基礎的鞏固和發展的鬥爭過程中，才能澈底肅清舊意識的殘存影響這一鐵的事實。另一方面，這種說法還可能被人誤解爲：另外某些上層建築（如國家、法律等）之可能而必需迅速改變，是由於它本身不具有所謂「固有頑固性」（即頑抗新基礎、新建築，掙扎地服務於垂死的舊基礎）；因而，好像沒有與那種「固有頑固性」的激烈鬥爭，它們就可以迅速的被改變，新政權就可以建立；而新政權建立後，對待這些不具有「頑固性」的上層建築就更無須「大張旗鼓」了。

再次，趙先生提出某些上層建築改變之「不迅速性」的動因之一，是由於在階級社會階段中，新基礎中新統治階級的「有意保留」政策。這又是因果倒置的說法。事實上，某些上層建築改變的「不迅速性」是客觀的規律，政策之「有意保留」與否是對這一規律的主觀對策。客觀上先有了上層建築的變革規律，然後才會產生政策的有意保留或不保留。上層建築本身的客觀發展規律，只能因政策而受一定程度的影響，但絕不能因此改變它基本的發展道路。例如，宗教改變規律在客觀上是「或遲」的，我們認識到它的改變規律後，才可能正確地製訂出一系列關於宗教的政策。我們對宗教不採取立即取消的政策，是產生在認識了宗教的改變規律以後。蘇聯對宗教的政策是「一方面在於組織最廣大的科學——教育宣傳和反宗教宣傳，促使勞動大衆實際脫離宗教偏見，另一方面在於對宗教團體舉行儀式不許有任何壓迫的可能性。」。（註三） 這政策是由於聯共（布）黨基於下列對宗教消滅規律之認識的結果，聯共黨綱第十三節中說：「聯共的方針是確信：祇有在羣衆的整個社會——經濟活動中實現計劃性和自覺性後纔會完全消滅宗教的偏見。」（註四） 由此可見，宗教政策是基於對宗教規律的認識上；先有規律，後有政策。宗教規律產生在前，是客觀存在的，而宗教政策不過是在對這一規律認識後的一種對策，是主觀的。這主觀上的政策雖然能對宗教發展規律有所影響，但宗教「或遲」變革的規律却不是宗教政策所賦予的。沒有這種「不峻急改變的政策」，它仍然是「或遲」發展着的。

總之，任何上層建築改變的規律是客觀存在的。不管你認識它不認識它，不管你違背這一規律或符合這一規律訂出政策，它自身發展的基本規律，既有其形成的原因，絕不因這一政策而有基本的改變。相反地，倒是這些客觀規律，決定着政策。

最後，趙先生還說，新基礎出現後對某些舊上層建築有一種「有意保留」的政策。雖然他接着解釋說：「從我們的原則上，我們對舊建築，自然毫不能也不需要存任何保留思想，然而在實施上、在付之於客觀實際上，則有着各別對付的必要了。」但不管怎樣，照趙先生的意見，在客觀實踐時，對某些上層建築確有「有意保留」政策。而且，從其上下文聯貫看來，這個「有意保留」政策也還存在於無產階級領導的政權下。我覺得，新基礎出現後，上層建築或多或少都在變動着，沒有一種可以原封不動的放在那裏加以「

保留」的。由於某一種上層建築「或遲」的改變規律，政策對它採取謹慎態度是對的，但這絕不是不以積極態度爭取它改變。因爲，客觀上完全保留既不必要而爭取改變的條件是完全存在的（即使宗教也有這條件）。例如新中國成立兩年來，宗教就有很多變動。鄉村中經過土改後，迷信觀點也大爲削弱。北京和尚道士的愛國大遊行等都說明，即使是一個離基礎較遠的舊意識形態之改變也是存在的。這些成就，顯然與我們政策的積極爭取其改造的精神是分不開的。我們對某些上層建築的政策，雖然採取謹慎辦法，但絕不可理解爲「保留」的消極政策。因爲當作一種革命政權，牠對任何舊上層建築的政策，都時時在推動牠向適應並爲新基礎服務的方向改變，而不是因其有「或遲」改變的規律，加以有意保留。如果將謹慎爭取某些舊上層建築改變的政策，理解是「有意保留」，那就抹殺了革命政權的能動性和創造性。我們對許多舊風俗、習慣、宗教等採取逐步改造的穩健政策，但還是運用着各種各樣的科學教育，報紙等宣傳唯物論和新的世界觀人生觀的方式，以積極削弱它們在羣衆中不好的影響。這種非正面的鬥爭方式，與「有意保留」是沒有任何共同之點的。在過去歷史上，如資產階級對封建社會中遺留下來而適宜於它統治人民的東西，好像曾是加以「有意保留」。但其「保留」，也不是原封不動，而是在適合於它階級利益的新方向之範圍內加以「保留」。但所保留的內容已因新基礎，新的階級要求而有變動了。如資產階級保留了中世紀基督教的一部分教義，但他們卻按資本的要求來解釋，卻按資本家的要求來麻痺人民，而不是按封建國王、封建領主的要求去解釋了。因之就宗教本身發展說，也不是可原封不動「保留」得住的。

以上，我們僅就趙先生對上層建築的「或遲或速」改變規律的原因，提出不同意見，而認爲上層建築「或遲或速」改變的原因，不在於它本身的有沒有「頑固性」和新統治階級的「有意保留與否」，而主要地，是由於那上層建築所據以產生的，存在於它外部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變化及上層建築某些特點造成的。

× × × × × × × ×

由於篇幅限制，本文不可能對上層建築「或遲或速」的改變規律作比較具體的分析，如果讀者對此問題有興趣，請參考拙作「上層建築變革條件及其規律的幾點商討」（文史哲雙月刊第一卷五期）一文，並希提出批評、指正。

附記

自從我寫的「再論基礎與建築並答趙宗復先生」一文在「歷史教學」月刊發表後，曾接蘇州華東革大政治研究院祁龍威先生來函，指出上文對上層建築改變的遲速問題，仍陷於錯誤，囑我再作深入探討。我以教課繁忙，並體弱多病，即委託同事葛懋春先生代爲處理。茲經葛先生研究，撰爲此文，並經華崗先生審閱，認爲足以糾正錯誤，補充讀者的理解。茲將此文投寄天津之前，謹此數語，並向上述各先生道謝。

趙儷生誌。

一九五一、十二、五日。

（註一）見於斯大林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頁八〇。（解放社版）

（註二）見於尤金著：斯大林關於語言學問題的著作對於社會科學發展的意義，學習譯叢第五輯頁十一〇。

（註三）見於社會主義與宗教頁五六——五七（天下圖書公司印行）中A·柯洛索夫著蘇聯的宗教一文。

（註四）同上書頁五五。

「一二八」上海抗戰簡紀

傅彬甫

一

「九一八」事變以後，賣國賊蔣介石聽從其主子美帝國主義的指使，實行所謂「絕對不抵抗」的政策，一切任憑帝國主義的安排。當時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日益嚴重，帝國主義間——尤其是英美帝國主義間是有矛盾的。美國所以要蔣介石不抵抗，自己也對日本妥協，目的在於換取日本進攻蘇聯，再用蘇聯的力量削弱日本，從而獲得中國的霸權（一）。這種打算應該說是「以退爲進」的，所以它與英國保守在中國的「利益」的打算，站在不同的立場。這時英國雖無力干涉遠東事件，但唯恐日本的積極侵略，妨害了它的利益，由「九一八」事變以後李定和薛西爾都對日採取了强硬態度。不過美國意圖是在獨佔中國。英國多問遠東事件，還想與美國有所競爭，美國自然不滿。因此美國就堅決不與英國合作，給英國一種壓迫。英國雖曾聯合法國在國聯理事會上作出兩次決議，卽所謂「要求日本撤兵至鐵路區域」（一九三一年九月底）的決議及所謂「要求日本限期撤兵」）一九三一年十月間）的決議（二），而美國都以冷淡態度對之，致「決議」均成爲具文。這種情況更使日本得以左提右挈無所顧忌的進行其侵略東三省的行動。至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間日本進攻錦州，蔣介石命令張學良幾十萬部隊不抵抗進入關內，於於東三省最後一隅地——錦州在一九三二年元月二日，也淪入日軍之手。錦州事件對美國是一個刺激，所以這時它便又想聯合英國，在外交上給日本一個威脅，意欲迫使日本停止南進，轉而進攻蘇聯。但這時英國政局變更，保守黨當權，對日本的態度巳改爲西門的妥協政策了（三）

英美帝國主義的矛盾，一方面使日本「順利」的進行其侵略東三省的計劃，另方面更鼓勵了日本軍人嘗試滅亡中國的野心，由之便產生了日本軍方進攻中國中心基地的計劃。日本侵略者這種計劃目的是「進」可以一舉滅亡中國，最低限度也可以在軍事勝利聲中壓迫國民黨政府承認東北旣成事實，並取締中國人民的抗日運動。這正是當時日本必然要採取的一個手段。因此，日本就選擇了長江咽喉、南京門戶、又爲中國最大的國際買辦市場的上海，作爲爆發事件的地點，產生了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變！

但在另一方面我們還應該說明：自「九一八」事後以後，在中國人民中間已經掀起了抗日的怒潮。一九三一年九月廿二日中國共產黨首先提出反帝抗日的號召，二十四日上海就有數萬學生罷課，三萬五千多碼頭工人反日罷工，二十六日上海十萬市民舉行了反日大示威，到二十八日京滬學生第一次赴京請願，羣集於國民黨政府門前憤恨的反對對日妥協、求和、不抵抗的政策，十一月平濟京滬學生更有第二次赴京大請願的舉動。可是國民黨政府對待這些愛國運動是怎樣的態度呢？那就只是威嚇、彈壓、逮捕、槍殺。當第二次學生赴京大請願時，國民黨曾預伏軍警流氓衝打開槍，學生死傷甚多，僅在國民黨中央日報門前，陳屍卽有三十餘具，國民黨中央黨部還發出文告說：「學生行動越軌，軍警乃自衛手段，正當處理」（四）！這是多麼令人痛恨的事情！

不過，國民黨政府這種種反動的鎭壓，不但沒有阻止住中國人民愛國運動的繼續發展，而却造成了國民黨營壘中新的分裂，卽一部分愛國軍人從此便背棄了他們，捲入到轟轟烈烈的人民的愛國運動中去了。其實例之一，就是日本進攻上海的時候，產生了十九路軍「一二八」抗戰事蹟！

二

「一二八」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在要求國民黨政府進一步取締中國人民抗日運動藉口下的一次有計劃的侵略行動。日本進行侵略的第一個步驟是「浪人政策」，想利用浪人不法的行動挑起釁端。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以五個日本和尙被毆藉口，日本就唆使浪人焚燬中國三友實業社工廠，並殺死中國巡捕搗毀商店。日本第二個步驟是以武力爲後盾，提出無理要求强迫當地中國政府允諾，二十一日日本海軍司令公佈：倘中國市長答復不能滿意，爲保護日人利權起見，決取必要步驟。二十四日日本的增援海軍艦隊抵達了上海，同日日本又自焚了公使重光公舘，反誣中國人所爲。二十七日日領事向國民黨上海市政府提出最後通諜，要求「道歉」、「懲兇」、「賠償」及「解散抗日團體」等項無理條件，並聲言二十四小時內不見滿意答覆，便將採取自由行動。（五）日本以爲：在民氣激昂之下，上海市長不會接受這樣的條件，一定可以引起衝突；而在「不抵抗」主義下，衝突勝利更一定很快的屬於日方，以便達其所欲。但事實却不如日本的理想，所有提出的條件，執行蔣介石不抵抗主義、一味奴顏婢膝的上海市長吳鐵城都很快的一一照辦了。因此它又不能不旁生技節，别外發動突衝的事件。這個新的事件

就是上海閘北保僑問題。

一月二十八日日本提出了上海閘北保僑問題，聲稱日本對閘北情況極爲憂慮，該處日僑衆多，決定派兵去該地保護法律與次序。（但事實上這時閘北的日僑早已撤移一空了）。日本更唯恐吳鐵城再一例接受它的要求，沒有用武的機會。在那天晚間十一點來鐘，貼出了將進佔閘北，希望中國軍隊撤退的佈告，只送給吳鐵城一個副本。（六）不久之後就開始進攻北站、江灣、吳淞等地，戰事便發生了。

在上海駐防、担當這次戰役的是十九路軍。十九路軍原在江西與紅軍作戰，「九一八」以後調來上海，上海和全國人民抗日的高潮，給十九路軍很大影響。（七）所以在戰事未啓之先，蔣介石曾派憲兵六團到上海接替防務，以避免眞的與日軍發生衝突。但日本發動的攻勢略早了一些，十九路軍未及撤離防地，戰事即告爆發。十九路軍乃與上海人民在一起進行了抗戰。

上海抗戰爆發，十九路軍一戰而挫日軍銳氣，再戰而舉世震驚。在第一防線作戰共達三十四日，使日軍四易主帥，增兵達十萬餘衆，軍艦達六十餘艘，飛機達百餘架，結果日軍犧牲，僅廟行鎭三天血戰已及七千餘人，鹽澤、野村等海軍將領固然都出了醜，植田、白川等陸軍將領也弄得驚慌失措。日軍在上海的戰績，只是肆行放火，濫投炸彈，殺害我國非武裝人民。

十九路軍的抗戰怎樣有這樣大的成績呢？就是它與上海人民並肩作戰並爲全國人民支持的結果。在戰事爆發之初，中國共產黨發動了上海十萬日廠工人的大罷工，堅持一個半月之久；並號召許多工人、青年學生、投奔前線，組織義勇軍或直接參加戰鬥或担任運輸交通、偵察、救護等工作。同時更組織和恢復了抗日救國會的組織，募集資金、物品支援前方，出版「反日民衆」等報紙，宣傳抗日政策。這樣，十九路軍在廣大人民英勇的援助下才打得日本落花流水。上海抗戰當中永不能忘記的更是工人、青年、士兵表現了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業蹟：在寶山一帶駐守的工人青年組織的義勇軍四百餘人，只有毛瑟槍五十餘枝，就曾擊退了日軍數千人的進攻。（八）復旦大學的學生參加了義勇軍、十九路軍的各種戰鬥，他們奮勇殺敵，死傷的就有二百餘人；十九路軍的一個士兵在作戰時身中槍彈，還向日軍猛撲，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九）這一些抗日的人民烈士，英名是永垂不朽的。

上海人民和十九路軍並肩作戰的時候，國民政府不但破壞、阻止各地人民對上海前線的援助，同時更派第五路軍來制止十九路軍了抗日。但第五路軍士兵激於愛國熱忱，反而參加了作戰，更增强了抗日的力量。不過上海人民和士兵抗日血戰，終在三月一日反動國民黨政府的出賣告密之下，使日軍得以在瀏河偷襲登路，而歸於失敗了。十九路軍和義勇軍在三月初便退出了上海。在這次戰役中犧牲了中國數萬軍民的生命，損失了值當時十六萬萬元的財產，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一二八」事變的一筆血債！

以上便是「一二八」上海抗戰的簡單經過，十九路軍退出上海以後，不久又被蔣介石調到福建去和紅軍作戰。這時十九路軍的領導人物逐漸覺悟到和紅軍作戰是沒出路的行爲。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軍將領聯合國民黨內李濟琛一部份勢力，公開宣佈與蔣介石破裂，他們在福建省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並與紅軍成立抗日反蔣協定。十九路軍和福建人民政府在蔣介石的兵力壓迫下失敗。此後蔡廷鍇等人逐步的轉入了與共產黨合作的立場（十）。與十九路軍一同撤退的一部分人民義勇軍後來怎麼樣了呢？我們可以引用當時他們的一段談話做爲結束：「我們唯一的目的是『抗日救國』，所以曾有誓言『以撲滅蹂躪我祖國敵人，以收復我東北失地，恢復我光華燦爛的祖國』爲已任，我們的槍口只有向外，……我們這次不能死於淞滬戰場，我們極想實踐我們第二句誓言，從速到東北加入義勇軍的隊伍共同殺敵……』（註十一）但後來他們終被反動的國民黨政府給解散了。

三

「一二八」事變時候，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國際買辦市場。帝國主義雖然因爲經濟危機的日益嚴重無力東顧，雖然英美之間存在着矛盾，但對上海的戰事却是不能不問的。日本軍人也知道這一層，所以他在上海進攻以前，估計中國軍隊是一例撤退，不值一擊，就對上海各國領事宣稱，四小時內就可以完全佔領閘北，使各國不致驚慌，俾得把上海事件作爲一種地方上的偶發事件來處理。但不料一戰再戰，中國人民和十九路軍愈戰愈强。這使得帝國主義各國不能再相信日本的提議，而只有出面「調停」——干涉了。在這裏，我們首先應該指明帝國主義之所謂「調停」，是在和日本妥協，犧牲中國主權的原則下，來進行的。

在國聯方面：當「一二八」夜間日軍砲轟上海閘北的時候，第六十六次國聯理事會正開會於日內瓦，於是國民黨政府照例又把上海事件提交國聯。但國聯非唯不採取什麼合理步驟，反而對「日本侵略中國，還是中國侵略日本」的問題還表示懷疑，而組織所謂滬領事團來調查！後經屢次請求，理事會才在二月十六日向日本發出照會，請求日本注意其對國聯盟約第十條所負的義務，並決議在三月三日才召集國聯大會，無形中使日本得到進行侵略的充分時間。等到三月一日中國軍隊在上海撤退了，國聯大會才在比較和平的氣氛中開會，並電中日限於三月三日下午四時以前停戰。在大會上對「一二八」事件，則認爲戰事已經過去，只須處理休戰問題，一切戰爭責任都撇開不提，僅僅作出幾項空洞的決議和留下一個十九國委員會而已。（十二）「一二八」停戰談判就是在這個十九國委員會監督下開始的，從三月十四日英

領事署第一次會晤，到五月五日簽訂賣國的上海停戰協定，其間英國代表曾先後提出折衷方案，一再向日本讓步，結果在上海協定中規定了中國在上海不得駐兵，中國允許取締抗日，十九路軍調離上海。這一賣國協定深爲人民所痛恨，因而發生了四月二十九日虹口公園的炸彈案件，日本軍事外交要人全部受傷；中國國黨政府賣國代表郭泰祺也被阻簽屈辱協定的人民代表打得頭破血出。五月五日的停戰協定中日雙方主要代表都是在醫院簽的字（註十三）。

在英、美、法的直接「干涉」方面：伴同着國聯的「調停」，英、美、法的直接干涉，應該說是對上海停戰更重要的一件事。二月二十八日英艦康特號上接洽上海停戰的問題，雖然說還是依從着國聯意旨進行的，但美、日、英、法曾舉行了秘密談判，而美國贊成日英、日法分別成立諒解，由英法織美國認可日本在東北的行動自由，作爲日本上海撤兵的條件（十四）。這種分贓式的會商，才構成了國聯「調停」上海事件的基礎。在這時美國曾聯合英、法、意諸國，向中日兩國提議，「中日雙方撤退在淞滬區之戰鬥員，建中立區，保護上海之公共租界」，要把中國國土變成以美國爲中心的帝國主義共管的區域，這一陰謀國民黨政府深表同意，而日本也便乘機提出在上海開圓桌會議的問題，釀成一九三二年四月以後的「上海自由市運動」。日本提出開圓桌會議計劃是「各關係國代表參加討論，以期對中國軍隊撤退辦法連同恢復並維持上海及附近之和平與秩序辦法，以及保障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並界內外人生命財產及利益得一協定。」藉此，日本想着與各帝國主義在上海獲取更多的政治權利。美、英、德、意諸國均表贊成，賣國的國民黨政府「在原則上並不反對」，（十五）但這是全中國人民所反對的。「上海自由市運動」是以日本的爲中心，帝國主義英美法意各國均欲參加的一種侵略陰謀（這是與美國提議共管上海相類似的辦法，）當時英僑胡特海曾經推波助瀾，並在外國報紙曾經發表了計劃，計劃大要是：（一）改變上海爲委任統治地，對中國政府僅有納稅的關係，政權歸於「特別區工部局」，不受任何國管轄干涉；（二）以公共租界法租界上海特別市及水路爲本區，以二十英里各地爲附屬保障區；（三）設立獨立司法裁判所，領事裁判權獨立；（四）中外人合組警隊，要求中國及列國撤兵，並聲明任何國不許使用兵力；（五）委任統治以三十年爲期（十六）。這種計劃根本就沒有看到中國的領土主權。後來終於因爲美日，英日因滬變而矛盾加深，問題才擱淺了。但這種陰謀行動充分的說明當時帝國主義英美德意諸國「調停」上海事件，並沒有絲毫的顧到中國的主權，只是爲了保護自己的利益，對日本讓步妥協，它們仍是在和日本一道來略中國的。

共管上海的陰謀不能實現，關鍵在於帝國主義間，美日、英日矛盾，因滬變而加深。「一二八」事變以後美國固然和英國一同與日本商談所謂「停戰」辦法，在中國作了很大的讓步，但另一方面美國國務卿史汀生的態度却轉變爲强硬，聲言如果日本打破了太平洋的均勢在華獲得特殊利益時，美國便有重新擴充海軍的權利，並在歐洲舉行軍縮會議時向各政府說明對日本「外交文書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十七）。與此外交步驟相呼應的行動，還有美海軍太平洋的會操向日本示威，會操以後並變更預定計劃，改變艦隊編制，將大部海艦長留駐太平洋沿岸，這種行動僅是給與日本在中國擴張勢力一種威脅，正是美國在「九一八」以後對日兩面政策的一個例證。（十八）「一二八」戰事發生以後非但美日矛盾加深，而且英日的關係也緊張起來，不過衰老的不列顛帝國已沒有力量與日本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爭霸，因此它一方面利用國聯對日本進行妥協，另方面則拉住美國暫時共同的決定它對日政策的航舵！

總之，「一二八」事變的停戰「調停」，一方面帝國主義在犧牲中國主權的原則下，與日本妥協了；但另方面也加深了帝國主義間的矛盾。不過我們更應該說明，當時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態度，並沒有什麼「善意」，它們的問題是在考慮自己的利益和能力，如何進行對中國「獨佔」、「共管」，或是「瓜分」！

四

在「一二八」上海抗戰過程中，最無恥的是國民黨政府的種種賣國、卑鄙、破壞抗戰的行動。首先在「一二八」的當日國民黨政府就搬出了親日派大漢奸汪精衛當了行政院長，蔣介石、汪精衛高叫「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實際是不要抵抗，只要投降。一方面採行了逃跑政策，首先遷都洛陽，繼又準備跑到西安。另方面始終和日本「維持雙方友誼」，密令海軍供給日方糧食蔬菜，海軍部次長李世甲更與日軍司令官野村同坐汽車參觀各處戰壕。在這同時，蔣介石又下令給國民黨軍隊要他們枕戈待命，切不可協助抗戰，違令者嚴格治罪；並繼續鎭壓各地人民的愛國行動，對十九路軍一點也不給接濟，還扣留全國各地的捐款。更向日軍告密，日軍得以在瀏河登陸致上海抗戰歸於失敗。最後又依靠英美帝國主義，準備同意上海的共管，定下了賣國的上海停戰協定。

國民黨政府蔣介石反動統治集團，爲什麼要這樣的積極破壞抗戰呢？胡華同志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初稿）中說的清楚：「這是他們四大家族的封建大地主、買辦大資產階級的階級地位決定的，他們擺怕革命的人民甚於擺怕日本。蔣介石說過『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還可以當亡國奴，尙可苟延殘喘，若亡於共產黨，則縱肯爲奴隸亦不可得』，這就是說若亡於帝國主義，他還能當帝國主義卵翼下的兒皇帝，四大家族還不至完全垮台，如果人民革命勝利（蔣介石叫做『亡於共產黨』）那末四大家族的法西斯統治是一定不能維持了」。

（下接第九頁）

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

蔡美彪

一 西藏古代的佛教與達賴班禪的由來

西藏有文獻可考的信史，始自松贊幹布（唐書作棄宗弄贊）。唐貞觀十五年（六四一年），李世民（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給他，當時內地所信仰的佛教才隨之傳入西藏。松贊幹布另外又娶了一位尼泊爾公主，她原來也信仰佛教。這兩位公主從不同的地方傳來了相同的宗教，藏人才逐漸的放棄了原來信奉的「崩滿」教，而皈依佛法。

後來，李旦（唐睿宗）又把金城公主嫁給藏王，生了一位太子赤松德贊。他開始大興佛教，達桑耶寺，並翻譯佛家經典，又請靜命菩薩度七人受戒，是爲藏人出家爲僧迦之始。

八四一年（唐會昌元年）在佛教史上所謂「三武一宗」之一的唐武宗在內地「滅法」的前後，西藏也出了一位藏王朗達瑪對佛教大加破壞，焚毀經卷，殺逐僧迦，西藏的佛教遭到一次很大的厄運。朗達瑪以前的佛教稱爲「舊派」（俗稱紅教），以後復興的佛教稱爲「新派」，新派之中最著名的有伽當派、薩迦派、迦畢派和新迦當派等。

到了宋代的時候，藏王智光鑒於當時西藏宗教情形的紊亂，特派人到印度迎請阿底峽尊者來藏整頓。智光死了之後，到他的姪子菩提光做王時，阿底峽尊者才被請到。他到藏後，針對當時的具體情況，造菩提道炬論，抉擇顯密，西藏佛教爲之一振，一時都爭來學法。這派就是所謂「迦當派」，「迦當」是「佛語教授」之意。

薩迦派的初祖是喜慶藏，較迦當派之阿底迦迦尊者稍晚。這派的第五祖慧幢大師，曾應元世祖忽必烈之請到內地來傳授佛法，並替蒙古人造了一套「蒙古新字」，在蒙藏漢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國史書上習用他的稱號「八思巴」，他所造的字也就被叫做「八思巴字」。這一派所傳的佛法兼俱顯密二宗，而尤以密宗的「歡喜金剛法」爲其特傳。當時內地的蒙古人、漢人和稱做「色目」的各少數民族都有不少人向這派學習此法。鄭所南心史上所說的「摩睺羅佛」，陶宗儀輟耕錄的「馬合剌佛」，庚申外史所說的「秘密佛法」或「演揲兒法」，就都是這一派。

迦畢派最初創自麻巴譯師，這派更略早於阿底峽，也是專習密部歡喜金剛諸法。它的末流便成爲不守戒律，後來新迦當派所排斥的也就是這些人。

新迦當派要算西藏佛教史中偉大的革命派了。這派的大師就是著名的宗喀巴，他依據阿底峽者的教授，修行顯密皆立一定程序，嚴守戒律，使西藏佛教重新發揚光大。這一派就一直傳到現在。

宗喀巴大師圓寂後，有兩位大弟子繼續弘揚他的佛法，世世轉生。這兩位一名克主結一名根敦主巴，就是後來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的前身，但達賴和班禪額爾德尼的名號並不是從這時就開始的。關於這一點，人們往往「語焉不祥」，現在很多讀者都希望進一步的瞭解，因而有稍加說明的必要。

原來宗喀巴大師圓寂後，他的弟子克主結繼續法位。轉生的第四代名羅桑却吉絳村，他在一五六七年（明隆慶元年）在藏絨楞主貢轉世，過了一年又去世了。直到一五七〇年（明隆慶四年）又轉生其家。一六〇一年（明萬曆二十九年），他開始主持後藏日喀則的札什倫布寺，才被叫做班禪。班是班底達的省稱，原來是梵語，意思是「有學問的人」，引伸爲「聖者」。禪是禪布的省稱，意思是「大」。兩個字合起來就是最有學問有智慧的人或是大聖者的意思。但這時並沒有「額爾德尼」的稱號，這稱號是一七一三年（清康熙五十二年）下一世班禪時滿清皇帝玄燁（聖祖）封給他的。我們在清實錄裏還能找到這條記事：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春正月……戊申，諭理藩院：班禪胡土克圖（彪案：此字爲普通高僧之尊稱）爲人安靜，熟諳經典，勤修貢職，初終不倦，甚屬可嘉。著照封達賴喇嘛之例，給以印冊，封爲班禪額爾德尼（清實錄卷二五三頁七下）。」

「額爾德尼」的原意是「寶貝」，引伸爲「崇高」「無上」之意。從此以後，便沿用着這個稱號。

宗喀巴的另一個弟子根敦主巴，曾到後藏弘發，後來班禪所住的札什倫

布寺就是他建的。根敦主巴圓寂後轉生爲僧海大師，還是住在札什倫布寺。再轉生爲福海大師，曾到青海蒙古各地傳佈佛法，得到蒙古人的信仰，蒙古的俺答可汗就加給他一個蒙語的封號「達賴」，意思是「海」，是遊牧民族最崇拜的象徵，用來表示至高無上廣大無邊的涵義。

從此以後，達賴就住在前藏，掌管全藏政治。

此外，還要附帶說明一點，雖然從羅桑却吉嘉錯和福海大師才有了班禪和達賴的稱號，但仍尊克主結和根敦主巴爲第一代，而他們兩位自已是第四代班禪和第三代達賴。

二、達賴班禪的轉世

相傳達賴是觀音菩薩的化身班禪是無量光佛的化身，他們都是藏人所最崇拜的宗教上的最高領袖。從宗教方面講，他們是長生不滅的。當前一代圓寂之後，在同年或一二年後就在某一個地方轉世。在這期間須要由地方當局派人四出尋訪出生的靈異小兒。有時在尋訪前先由拉穆吹忠作法降神，神附體後指明轉世的地帶做爲尋訪的根據。也有時前一代圓寂前自已暗示轉世地點的。但往往尋訪來的不只一位，這就需要一番判斷才能發現眞正的化身。他們常用求卦的方法，但很多時候轉世的化身是有一些突出的神迹的。如：第三代達賴出生不久就會念「六字大明」並能知宗喀巴出世源流。第十代達賴出生時，屋頂上有祥雲，柱上有甘露，室內忽然飛入彈丸等。第十一代達賴生在噶達，據說第十代達賴派噶達堪布起程時，曾暗示給他將來要在噶達轉世；十一代達賴出生前，噶達地方也忽生黃花至多不衰。此外，歷代班禪的轉世也有很多神迹，這裏不再多舉了。

這種轉世的辦法，要是遇到地方政府裏的跋扈人員不遵佛法，妄徇私意，就會發生一些流弊。如第五代達賴圓寂後，第巴桑結想乘機專權，竟而僞造說達賴入定，秘不發喪，經滿清政府責問後，才秘奏說：「第五世達賴喇嘛已於壬戌之年示寂，轉生靜體，今十五歲矣」。實際上是他私立了一個「僞達賴」，與準噶爾部之間發生大戰。戰爭過後，才找到轉世的眞達賴立爲第六代。又乾隆時第六代班禪來北京，在京示寂，仲巴和瑪爾巴也在西藏發生戰爭，並引致廓爾喀人入犯，釀成大亂。亂平之後，滿清皇帝弘曆（高宗）就另外爲西藏製訂了一種轉世的補充辦法，頒給西藏一個「金奔巴瓶」，遇到尋訪的靈異小兒，呈報互異，就把他們的名字生日寫在籤上投入瓶內抽籤決定。這種辦法是從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才開始的。大淸會典事例卷九七五曾記錄當時的「上諭」說：

乾隆五十七年，諭：西藏爲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駐錫之地，各蒙古及番衆人等前往煎茶瞻拜皈依佛法，必其化身的確，方足以衍禪教而服人心。……嗣後應令拉穆吹忠認眞作法降神指出，務尋實在根基呼畢勒罕名姓若干，將其生年月日各寫一籤貯於由京發去奔巴瓶內，令達賴喇嘛會同駐藏大臣公同念經（註），對衆拈定，具奏、作爲呼畢勒罕。不得聽其仍前任意妄指，私相傳襲，以除積弊，而服人心。

有時尋訪的小兒很多，就只從其中選出三位來，然後把這三人寫到籤上抽定。不足三人時，也需等找滿三人再抽。如「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諭：……此次裏塘幼孩即作爲入瓶掣籤之一，俟續有報者再得其二，方可將三人之名一同緘封入瓶，按定制對衆諷經掣籤」（同上）。這種在佛前念經掣籤的辦法是在一般的情況下應用，如遇到特別靈異的，足可斷定是轉世的化身，那也可以免去這層手續。如「嘉慶十三年（一八〇八），理藩院奏准達賴喇嘛呼畢勒罕尋得時，靈徵昭著，不復入奔巴金瓶掣定（同上）。」

以上所說的這種轉世的辦法，從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起，就一直被沿襲下來。

再有，在活佛轉世之初，必須先受戒習經，還不能執政，在這期間就由攝政管理政事。等到了相當年齡後（普通在十七八歲也有較早的），再正式親政。現在的第十四代達賴就是在去年才親政的。

「註：這裏所說達賴念經拈籤是指班禪轉生，若達賴轉生時就由班禪念經拈籤。

三、達賴班禪的美好關係

克主結和根敦主巴同是宗喀巴的兩位大弟子，而彼此又非常要好，他們之間的美好關係自不必說了。後來轉世的歷代達賴和班禪，在轉生後抽籤、坐床時，也都是彼此的前一世代爲主持，除去少數例外都還爲之傳經授戒。因而歷代的達賴和班禪都始終保有師生之誼，互相授受宗喀巴大師的大法。自從克主結和根敦主巴以來，約五百年間，無論在政治上、宗教上都有着深厚而悠久的美好關係。其間如第四代達賴在十五歲時由第四代班禪傳授大戒。第五代達賴轉世時，第四代班禪已經預知而到他家去迎接，這位達賴轉生的靈兒，見到班禪後即很熟習的說：「你怎麽這樣晚才來呢？」到了六歲的時候，就由第四代班禪授戒傳經。第四代班禪圓寂後，第五代班禪從第五代達賴受戒學法，但他後來又是第六和第七兩代達賴的師長。第六代班禪是第七代達賴的弟子，但又是第八代達賴的師長。第八代達賴是第七代班禪的師長，第九第十第十一三代達賴又從第七代班禪受戒學法。

前一章的第十三代達賴在一八七六年（清光緒二年）降世，第八代班禪

因爲他出生時靈徵昭著，就主張不用抽籤卽行決定，迎到前藏，由班禪代爲剪髮傳法。第四代班禪在一八八二年圓寂。在認定下一代的班禪時，傳說曾有一段故事。第十三世達賴十一歲時卽自行認定班禪轉世在朵仲家，他拿了三個橘子放在一個銀盤子裏，面向觀音像和吉祥天女像誦咒。最初，三個橘子都在盤子裏轉，後來指定爲朵仲的一個橘子忽然躍出滾到達賴身邊。把它再放進盤子裏，它還是同樣的滾出來。於是達賴說班禪必定轉生在朵仲家裏，後來在金瓶抽籤，抽出的果然還是朵仲。一八八八年，第十三代達賴便給這個新轉世的第九代班禪落髮，還給他起了法名。

第十三代達賴是第八代班禪的弟子，又是第九代班禪的師長，在彼此認定時還有這些靈徵和神迹，他們最初的關係本來是非常美好的。自從英國的勢力侵入西藏後，加緊多方面的侵略，一九〇四年，英國榮赫鵬的侵略軍隊打倒拉薩，第十三代達賴逃來內地，返藏後因滿清軍隊進攻，又逃往印度。辛亥革命時，英國送達賴回拉薩，從此以後，英國更進一步的拉攏達賴並破壞藏族內部的團結，挑撥感情，唆使第十三代達賴壓迫第九代班禪苛以重稅。終於在一九二四年把班禪逼出西藏來。班禪逃出後就來到內地各處，並曾在北京講經說法，羅桑彭錯還把它記錄下來，寫了一本班禪說法錄（滄海叢書第三輯）。」

第九代班禪被逼出後，一直沒能回去，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一日圓寂於西康玉樹，壽五十五歲。現在的班禪額爾德尼是轉世的第十代，現年十四歲。

第十三代達賴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日圓寂，壽五十八歲。現在的達賴是轉世的十四代，年十七歲。

第十四代達賴和第九代班禪到現在還沒有見過面。由於前一代的時候，帝國主義者的卑鄙的侵略行爲，破壞了西藏內部的團結，使得達賴班禪約五百年來的美好關係暫時的受到影響。但是，帝國主義者這種破壞的陰謀是必然也已經被揭穿和粉碎了。我們的西藏已經得到和平解放，在和平解放的協議裏也已規定達賴和班禪恢復第十三代和第九代和平相處時的關係。我們相信：達懶班禪的深厚而悠久的美好關係必能隨着西藏的和平解放而恢復、而鞏固、而發展。西藏民族的內部必定更加團結，並進而與中華各民族日益團結，在建設新中國新西藏的當中貢獻出最大的力量。

一九五一，十一，廿，於北京大學。

（上接第六頁）

五

「一二八」上海抗戰，雖遭國民黨反動派的破壞和出賣而失敗了，但它的意義還是很大的。

首先，抗戰證明了中國人民是有力量打倒敵人的，從此就提高了中國人民抗戰的信心，東北義勇軍的抗日行動，因之便日形堅強起來。同時，抗戰更粉碎了當時日軍幾小時佔領上海的夢想，和當時中國恐日病者的三天亡國論。

抗戰中蔣介石反動統治集團暴露了種種賣國投降的卑惡醜態，使中國人民認清要抗日就得反對國民黨的統治，從而使中國社會階級關係更起了新的變化：卽不但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更加積極的起來反對蔣介石的統治，而且自由資產階級和蔣石介集團的矛盾也逐漸表面化起來，國民黨內部更產生了新的分裂。這種分裂，在九一八事變時有馬占山在東三省的抗日行爲，及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國民黨二十六路軍的寧都起義；到「一二八」事變時有十九路軍的抗戰，第五路軍的參戰；後來一九三三年蔡廷錯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與紅軍成立抗日反蔣協定，同年馮玉祥也和共產黨一度合作建立了抗日同盟軍，更說明這種分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抗戰更證明了國民黨反動集團所倡言的「依靠國際公理」的主張，完全的騙人的胡說。上海停戰談判中，國聯與日本妥協的面貌，和英美法意帝國主義共同侵略中國醜惡的面貌都表現出來了，從此中國人民更深刻的認清要抗日就要靠中國人民自己的力量，對帝國主義抱幻想是完全錯誤的。

一：見劉大年著：美國侵華史
二：見東方雜誌第二十九卷第八號
三：見東方雜誌第二十九卷第八號
四：見陶官雲著：中國近百年史話
五：參一九三三年國聯大會中日事件報告書
六：見申報月刊一卷二期
七：見毛主席著「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註九
八：參申報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九：見申報月刊一卷二期
十：見毛主席著「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註九
十一：見申報月刊一卷一期
十二：見申報月刊一卷一期
十三：見申報月刊一卷一期
十四：見劉大年著：美國侵華史。
十五：見申報刊一卷一期
十六：見申報刊一卷一期
十七：見申報刊一卷一期
十八：參劉大年著美國侵華史

日本戰敗後初期的勞工運動史

(自一九四五年至四六年)

渡部徹著
陳信德譯

引言：今年春天，翻譯了日本渡部徹先生所著的「日本勞工運動史」（原名：「日本的勞働運動」），已經在上海東方書社出版；該書只寫到日本投降爲止，沒有談到戰後的部分。後來，渡部先生給我寄來他的另一部著作「近代日本勞働者運動史，」內容十分豐富，也有關於戰後的歷史；不過也只寫到一九四六年，因爲該書出版在四七年。本來想將這部分翻譯出來，附在「日本勞工運動史」的末尾；但總覺得只寫到四六年是美中一點不足。最近，渡部先生又寄來一些對這一部分的訂正和補充，並從新寫了「最近日本工人階級的狀況與動向」一文，和上述部分結合起來正可構成「日本戰敗後的勞工運動史」或史料。這裏所登載的是「近代日本勞働者運動史」的最後一章，「最近日本工人階級的狀況與動向」擬在次號續登。

渡部徹先生，於一九一八年生於大阪。四一年畢業於前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部。在校期間，從三九年參加反戰反軍國主義學生運動；四一年冬被捕，被拘五個月。四二年秋被徵入伍，以一兵卒身份在軍隊內致力於反戰空氣之醞釀；四五年敗戰後在大阪。京都參加民主主義運動，並從事於日本勞工運動史之研究。一九四九年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副教授，並站在陣首參加教員的工會運動。

一、日本的敗戰與民主主義革命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瘋狂無比的日本帝國主義，終於向物質上。精精上都具有偉大的。壓倒的力量的民主主義聯合國軍屈膝，不得不接受波兹坦宣言，在完全無條件之下投降了。在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這一事實，雖然在一方面意味着日本帝國主義的崩潰；但是在另一方面，由統治階級的人們對「護持國體」所付出的努力這一點可以看出：這是他們打算繼續維持舊統治體制的一種企圖。因此，儘管波兹坦宣言明文規定：『對恢復與加強日本國民的民主傾向的一切障礙，日本國政府應予以芟除；同時應確立言論。宗敎。思想的自由，並尊重基本的人權；』日本的統治階級對此雖也矢誓要忠誠履行；但是在事實上，他們却盡其可能想拖延日本的民主化。在這時期，日本人民竟是那樣地沒有毅力，那樣地精神頹喪，甚至於對統治階級這種最後的掙扎也不能從下面起來加以制壓和約束，不能由自己起來成爲民主化的推進力量！

因此，事實上對日本民主化的基礎條件之創造和促進，就完全要仰仗聯合國軍的佔領和它的指令。其第一砲就表現在一九四五年十月所發出的「關於政治。信敎和民權自由之限制的撤廢」這一指令上。因此，凡是限制思想、信敎、集會、言論、結社之自由的法令固不待論，其他一切壓制市民之自由的法規都被廢棄或停用；與此同時，政治囚犯之卽時釋放，憲兵、特高警察和其他一切的鎮壓機關之廢棄，以鎮壓爲任務的官吏之罷免等等也都實現了。接踵而來的就是：作爲產業民主化之一項的「關於獎勵和保護工會以及改革耕地制度」的指令；而根據這一指令所制定的就是「工會法」和「耕地調整法。」到第二年的一九四六年一月，佔領軍又命令日本政府整肅軍國主義者和超度的國家主義者，不許他們充任官吏或公職；並命令解散右翼反動團體。至此，凡是對民主主義之生成和發展有阻礙的制度上，政策上或人事上的各項因素才被初步肅清，因而奠定了實行民主化的基礎條件。當然，這一連串的佔領政策，一方面是仰仗以蘇聯爲首的全世界反對法西斯主義的人民力量；同時在另一方面我們應該注意到：這是負責佔領日本的美帝國主義企圖在它的統治下把日本的政治經濟再整編起來，想巧妙地藉此來蒙蔽勢必來臨的日本人民革命情緒之高漲，要用「由上而下」的改良來防遏人民革命的一種欺騙政策。

雖然如此，日本的統治階級對這種佔領政策還是公開或隱秘地採取妨害或怠慢的態度。比方說：一接到解除武裝的命令，馬上就企圖擴充或加強警察力量；要它撤廢「治安維持法，」就想以「不敬罪懲治法」來代替；或者因不肯釋放政治囚犯，不肯切實廢棄特高警察，結果內務部大臣被聯合國軍命令撤職；一看見人民鬥爭之高漲，便起草了「大衆運動取締法案；」在議會上企圖避免「工會法」和「耕地調整法」之制定，等到知其不免，又想把它變成有名無實的法律等等，賣弄了一切卑鄙可恥的手段。

這樣，由於戰敗的結果所引起的一連串的事實——日本國土被聯合國軍佔領，日本的主權從屬於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以及聯合國軍佔領政策之實

施等等——不得不使日本資本主義的構造爲之改觀；而日本人民在表面上總算得到了前此未曾享受過的民主自由的權利；同時，對於民主主義革命這一巨大車輪的推進，日本人民也被賦課了一個重大的任務。

二、政治運動之發展

這樣，日本被聯合國軍具有歷史性的力量所打敗，並且只有仰仗聯合國軍的力量才能推進民主主義革命，這一事實就明確地證明了：包括無產階級在內的大多數日本人民在資本家和地主的天皇制獨裁權力之下是怎樣地被剝盡了它的毅力！戰爭一宣告失敗，軍隊之解散逼使大量的將士還鄉，各種企業活動都爲之停止或縮小，在職的工人大量地被裁，徵用的員工乃至動員的學生大批被趕出工場，所以在某一時期曾呈現了混沌的狀態；在這一期間，日本人民除了袖手傍觀以外，完全無所事事。

在這種狀態之下，對於勞工運動之更生的胎動，首先是由「日本社會黨」結黨籌備會開始的。一九四五年九月，爲應付新情勢起見，在以前的合法無產政黨幹部之間有人提議要設立無產政黨；因此就在安部磯雄、高野岩三郎、賀川豐彥三位長老的提倡之下召開了籌備會，在十一月一日正式成立了「日本社會黨。」但是，這個政黨是以戰爭期間中在議會佔有議席的十二位「代議士」（卽國會會員——譯者）爲中心勢力，只是烏合了以前的「社會大衆黨」和「日本無產黨」的幹部而成的；在黨內包括着不少個戰犯性質的被整肅分子和階級運動的落伍者；所以，儘管它在綱領上怎樣把自己說成是『在政治上以民主主義，在經濟上以社會主義，在國際上以和平主義爲目標的勤勞階級的大衆政黨』（水谷長三郎著：「日本社會黨綱領」），其實在黨的內部却毫無統一性和一體性。譬如黨的構成就包括着右派、左派和中間派的各種分子，而各人都以不同的階級勢力爲地盤，企圖加强自己及其集團的勢力。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他們對驅使日本人民陷入今日之悲慘環境的帝國主義戰爭都不肯作出徹底的反抗，甚至有人對戰爭還採取過雷同的態度。這一事實就非常限制了黨的性格；譬如他們對天皇制和憲法問題的態度——要維持天皇制，認爲主權在國家——就是一個突出的例證；所以他們只好始終採取妥協的、追隨的態度。因此，對於它究竟能不能成爲眞正的階級政黨這一點，一般人民都抱有很大的懷疑。所以「日本社會黨」的成立，起初在羣衆中並未引起任何影響和感銘。

到了十月，根據聯合國軍的指令，政治囚犯獲得解放，言論。集會與結社得到了自由以後，在慘無人道的虐待與拷鞠之下，被瘋狂的天皇制政府監禁了十八年的德田球一和志賀義雄，以及其他獄中。獄外多數的共產主義者都一齊開始活動，勇敢地在大地上竪起了日本有史以來初次被承認爲合法政黨的「日本共產黨」的旗幟。首先，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者所挑起的這次暴虐的戰爭，除了這些共產主義者以外，差不多沒有人曾作過始終一貫的徹底的反抗；所以對他們的解放，日本和世界各國的人民都寄以極大的注意和期待；甚至於讓美國開名的遠東研究家安德留・羅斯說：『日本的民主化必從監獄開始！』他們即時把停刊已久的機關報「赤旗」恢復起來，並在各地的「解放運動出獄同志歡迎大會」上，或者通過廣播和報紙展開了强力的有組織的宣傳活動。特別是他們所舉出的「打倒天皇制」的口號，給了一般人民很大的衝動，在日本全國引起了贊成和反對兩種議論的漩渦。同時他們對於工會或農民協會等等勞動人民的組織、耕地制度的改革、戰爭罪犯的追究、隱藏物資的揭露等等，凡是和日常的政治經濟有關的各種問題，都付出獻身的鬥爭，努力想把「從上而下」的民主革命和「從下而上」的民主革命直接連結起來。在另一方面，他們認爲應該建立人民戰線，首先向「社會黨」提出共同鬥爭的建議，作過幾次的提案，但每次都被拒絕了。因此，在這一點上沒能收到可談的成績。

到一九四六年，無產階級的組織越加擴大起來，在工資的提高，戰犯的整肅，企業的民主化等等日常的經濟問題方面都掀起了鬥爭高潮；同時在國內政治的領域上，作爲保守和反動政黨的「進步黨」與「自由黨」，對作爲民主力量的「社會黨」和「共產黨」的對立也明顯化起來了。而且，由於敗戰後第一次實行總選擧的日期之接近，一般民衆都切實希望建立民主力量的統一戰線，希望打倒保守的反動勢力；因此，包括「社會黨」「共產黨」和其他民主主義的工農團體、文化團體在內的人民戰線之建立，也就被搬上具體日程了。正在此時，多年在國外致力於反戰鬥爭的野阪參三回國，主張應該建立「被人民親愛的共產黨，」明確劃分了「天皇制與皇室」之間的關係，提倡「廢止制度上的天皇制，」以此來代替從前「共產黨」所主張的「打倒天皇制」的口號，同時並主張建立民主戰線爲當前迫切的任務；因此，建立民主人民戰線的空氣就達到了最高潮，有些地方居然實現了共同鬥爭；在中央也由山川均的提倡成立了「民主人民聯盟。」但是，「社會黨總部」却仍然採取消極態度，只肯同意在總選後建立民主戰線。因此，雖然有了人民熱烈的願望，民主戰線却只是一陣呼聲，在實際上就等於沒有進展。

在這種情況之下，「共產黨」在二月召開了第五次大會，討論並決定了黨今後的戰略目標和鬥爭方法；並發表了劃時期的宣言說：『黨的當前的基本目標是要以和平與民主的方法來完成眼前正在進行中的資產階級民主義革命；』全面地否認了從前「共產黨」所主張的暴力革命論。爲此，首先要

「廢止封建的、專制的、作爲軍事警察政治制度的天皇制；」要『以人民主已掌握主權的民主制來代替天皇制，並建立以一院的議會爲骨幹的人民共和政府。』然後，『待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完成之後，我黨將按我國社會的發展情況，在大多數人民的贊成和支持之下，由人民本身的努力，以和平與民主的方法，使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爲更高度的社會制度，那就是不以人剝削人的社會主義制度。我黨堅決認爲：這是社會自然的發展，並且是必須經過的過程。爲共實現，黨不採取暴力，排斥獨裁，要以適合於日本社會之發展的民主主義人民共和政府，以和平的、敎育的方法來達到目的』（第五次大會宣言）。前此，對於建立民主人民戰線的提議，「社會黨」始終認爲『共產黨是要以暴力革命……，』以此爲理由拒絕參加；所以「共產黨」方針對「社會黨」這種藉口，由它本身表明態度，明確地否認了暴力革命；這就是這次宣言的政治意義。但是，這一宣言却犯了很大的錯誤。誠然，當時的佔領軍也曾實行了一些解放軍的任務，但是它的本質却完全是帝國主義的軍隊。這一宣言的錯誤就在於：它完全抹殺了這種事實，使日本人民摸糊了反帝鬥爭的意義及其必要性。因此，不管它的意圖如何，在原則上它是應該受到批評的。不止如此，到後來佔領軍已經完全暴露了帝國主義軍隊的本質，日本人民已經很明顯地陷入了殖民地環境之後，「日本共產黨」對這點還忽略了公開的自我檢討，結果才受到「共產黨國際情報局」的國際批評（一九五〇年一月）。這姑且不談，在以後不久所施行的敗戰後第一次總選舉上，民主力量雖然不得不冒着不利各自孤軍奮鬥，但是「社會黨」居然爭得了議會的第二黨地位，「共產黨」也初次推出五位黨員去當議員；這樣，民主力量的壯大，已經是不可移易的事實了（參照第一表）。這種力量之高漲，立刻就

第一表　一九四六年總選結果

	候選人數	當選者	得票數（單位千票）	在總票數中所佔比率（%）
社會黨	三三一	九二	一〇，一六四	一八，一三
共產黨	一四三	五	一，八五四	三，八

表現爲民主力量和保守勢力之間的緊張的對立，——例如：打倒幣原內閣野黨四派共同委員會。五一勞動節。後繼內閣組閣問題等——因此在事實上就等於成立了民主人民戰線的狀態。在這當中，「社會黨」又暴露了它複雜難堪的黨內糾葛，特別是左右兩派的對立問題；尤其右派的分子竟蹂躙了羣衆的願望，瘋狂地去爲和保守派的聯携工作而奔走，完全再暴露了他們以前所有的，社會帝國主義者的面貌，因此觸阻了民主力量更進一步的發展。同時，他們還讓黨內的「民主戰線特別委員會」作出什麼「以議會部和羣衆部爲兩條基幹的救國民主聯盟方案，」提倡了偏重議會，藐視工農文化團體的民主戰線，企圖以此來加强他們自己的勢力。這一方案卽時引起了「共產黨」和其他羣衆團體的猛烈反對；結果「社會黨」不得不片面地發表了沒有「共產黨」參加的，完全沒有意義的。關於成立「救國民主聯盟」的聲明。因此，民主戰線終於從「中央」自然消滅了。就這樣，在「社會黨」和「共產黨」之間又形成了一條深溝；並且反動派的攻勢也乘隙猛進，所以更加强了「社會黨」右派的領導力量。同時在「共產黨」方面，也因從前統治階級的瘋狂鎭壓，所有的黨組織從一九三四年以後完全被壞破，一切的羣衆運動都被封鎖，主要幹部大多數被長年監禁；所以在以後十年間，世界革命運動呈現了驚人發展的時期，無從吸收世界革命的經驗和敎訓。因爲有這一段歷史上的不幸，以及由這不幸所引起的後果——指導部缺乏正確的理論，根深難拔的小黨派性，對羣衆性的政治運動缺乏經驗等等，就使他們把剛剛要成立，而且須要成立起來的民主戰線推開到遠遠的對岸去了。

最後還有一點應該注意的就是：雖然「社會黨」和「共產黨」在政治上都佔有重大的比重，可是實際上的黨員數目在以後却沒有多大增加。「社會黨」在議會上雖形成了相當大的勢力，但是在羣衆鬥爭方面的領導力却非常薄弱；「共產黨」在羣衆運動方面雖有强大的領導力和影響力，但是積極支持黨的人還是不多。（待續）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日於北京大學

文史哲第一卷第四期要目

山東大學文史哲雜誌社出版　定價三千元

爲「毛澤東選集」出版而歡呼……孫思白
從抗日到抗美的歷史規律……華崗
讀「武訓歷史調查記」……本載
論「亞細亞生產方法」……童書業
魯迅論文藝……華崗
評葉蠖生著「中國歷史課本」……楊向奎
青島市中等學校歷史敎學研究會工作總結……于啓民

豫西考古紀略

——對於仰韶文化的新認識

安志敏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於本年四月組織了河南省調查發掘團，由夏作銘（鼐）先生領導，參加者有王仲殊先生、馬得志先生及著者三人。本次的調查路線是河南的西部，自鄭州至澠池，預定計劃是偏重調查史前時期的遺址，必要時可以作小規模的發掘工作。我們自四月十五日正式展開工作，而結束的日期是七月十二日，前後共用了三個月的時間。

豫西的史前文化在中國史前史上佔相當重要的地位。三十年以前，瑞典人安特生在澠池縣仰韶村發現了彩陶文化，定名仰韶文化，以後他繼續派人在河南搜集史前的遺物，結果又在成皋縣廣武鎮發現了秦王寨、池溝寨、牛口峪三處遺址，不過安特生並沒有親臨其地，僅由他的助手去搜集標本而已。

自從就特生發現了仰韶文化以後，給中國學術界一個很大的衝動，但是由於他所研究的結論，包含着帝國主義學者的偏見，因而演出了許多問題。同時，他所發表的器物，有些根本不是親自發掘出來的，所以存在着好多可疑點。雖然在最初大部份人相信他的說法，不過後來我國學者們已經開始懷疑，提出問題，爭論了一二十年，而未解決。這次我們的任務，就是爲了要瞭解仰韶文化的性質，而且要尋求一些線索。結果發現了它的癥結，給與了適當的修正。

當我們於四月十五日在鄭州會齊以後，便立即展開了調查工作，前後一共調查了二十三處不同時代的遺址，採集了許多遺物。並在廣武鎮的點軍台、青台，以及澠池縣的仰韶村作過三次小規模的發掘，除了採集有相當數量的標本以外，並解決了一些重要的問題。我們已有初步的報告，在中國科學院出版的科學通報二卷七期及九期中發表。現在撮述大要如下：

一　點軍台的發掘

點軍台在河南成皋縣廣武鎮東南約三里許，位於平陶故城的東面，這裏僅是一個稍爲墳起的小土丘，最高處較周圍高出四公尺餘，向四周慢慢的降低，斜度不大。遺址的面積，如果根據地面上所分佈的陶片來作估計，大約東西長三百餘公尺，南北寬二百餘公尺。我們在土崗的最高處掘了一條東西長三十公尺，寬二公尺的探溝。發掘工作時特別注意地層的劃分，我們是仔細辨認土色，劃分地層，更以各層的出土物來勘對，把探溝的四壁都測繪詳密的剖面圖。在這裏的地層相當複雜。如這次所遇到的第五號墓葬（漢墓）和第二號灰坑，內部的墳土都是由耕土下直達文化層下的生黃土。如果忽略了層次的關係，而專以離地深淺爲準則，每若干公寸爲一層，那一定要發生重大的錯誤。

點軍台的地層除了地表面的耕土層外，可粗分爲上下兩層。上層（卽第二層）厚度〇、七——一、五公尺不等，土色灰褐，陶片數量甚多。包括細柄灰陶豆，圜底繩紋灰陶罐，繩紋及寬絃紋的紅陶罐等，又曾出土鐵器和小銅刀，這些遺物似乎屬於東周時代；遺物中也夾雜着少量的早期陶片（彩陶及黑陶）、石器和蚌器等，當由於下層的混入。此層內又有灰坑，略作圓形，深淺不一，淺的不過半公尺，深的如灰坑二，達四公尺猶未至底，打破了早期墓葬和生黃土。

下層（卽第三層至第五層）與上層相銜接。在A段有爐灶痕跡，土色因含多量灰燼致成黑色，並有很多大塊的紅燒土。B——C段土色黃褐夾有細碎紅燒土，有時夾有一薄層的黃砂或灰土。這層所出土的遺物，沒有晚期的遺物。所出陶片多是龍山式，有鼎、直筒杯、粗柄豆等，也有夾砂粒的灰褐色繩紋粗陶，如平底罐和鬲的。此外還夾雜有少量仰韶式彩陶片、紅陶片、陶環殘片及粗陶鼎足等，仰韶文化系統的產物。深處（卽第四層）所出土的陶片、紅陶所佔比例較大。這下層裏也有灰坑，出土物與文化層的遺物完全相同。再往下便是生黃土了。離現在地面約四、六公尺。

在下層的底部，我們發現了十九座早期墓葬，它們緊密的互相靠攏着，有幾座是相重疊的。頭部多向西方，也有幾座向東方的，仰臥，兩手置於腰旁，其中有幾座墓葬被第四層灰坑及第二層灰坑（如灰坑二）打破，所以它們的時代應當比較早，但也早不了許多。在第二十號墓葬中，在頭部附近置有一個刻絃紋的陶罐，腰側有灰綠色板岩所製成的石環。這兩件都是仰韶文化中所常見的。不過像這樣完整無缺的石環，在河南還是第一次發現。同時

可以證明它大概是懸飾，而不是套在手腕和足踝的鐲環。可惜除這一墓外，其餘的都沒有殉葬品。

點軍台的發掘工作範圍雖然不大，但可以證明這裏的彩陶文化和龍山文化的關係，和豫北情形不同。在豫北是兩種文化上下相疊。但這裏却是彩陶和黑陶兩種的混合文化，後來我們更證明澠池縣仰韶村的地下遺物，也是這種情形。由此可證豫西是有這樣一種混合文化存在過的。

二　青台的發掘

青台村在廣武鎮西約八里。遺址是在村東的高崗上。南臨旃然河（俗稱澗河）故道，最高處比河床高出十七公尺，比青台村高出約九公尺。遺址的面積，以陶片所分佈範圍來作估計，東西約四百公尺，南北約二百公尺，斷崖上所露出的灰層也相當厚，我們為了尋找可以和點軍台作比較的材料，在點軍台結束以後，就決定在這裏做小規模的發掘工作。

我們在青台一共掘了兩條探溝。探溝一是在最高處的西邊斜坡上。東西長三十公尺。表面耕土層以下便是第二層的文化層，土色黃褐，夾雜紅燒土碎粒及炭末。遺物有紅彩陶片、完整的陶鼎和陶罐、紅陶片、灰黑或灰褐陶片，以及陶環等。

第三層是草泥土，顏色青灰，夾有草莖（麥稭）的痕迹，再下幾層，各段的層次，顏色不完全一致。第四層與第六層都有大灰坑。

第六層所出土的以紅陶佔大多數，與上層以灰黑陶為主略有不同。並且出了幾個完整的陶鼎和陶罐，並有一個完整的平底彩陶碗。各層裏都有少數彩陶（包括紅彩與塗白衣的兩種）、陶鼎足、陶環殘片、打製陶刀等，但石器絕少，可能是由於遺址附近缺少製石器的原料。

自第二層起連續出了許多墓葬，特別是第二層至第三層為最多，大部分是與文化堆積層屬於同一文化的。其中有十六座甕棺，是用二個或三個陶罐套合而成，也有用陶鼎的，所用的陶器，有些和文化層裏所發現的相同，至於有的如繩紋圜底粗陶罐，在遺址還沒有見到。在甕棺裏所葬埋的都是嬰兒或幼童，但無殉葬品。此外還有四座成人墓葬，頭部向西，仰臥，僅有一座用陶鼎作殉葬品。河南史前墓葬發現還很少，這次我們又獲得了很多的新材料。

探溝二的所在地，在探溝一的南邊約五十公尺處，地勢較探溝一低兩公尺。在梯田的崖壁上露出了成層的白灰面。所出的遺物相當探溝一的第六層，以紅陶居多，並發現石刀、石紡輪及帶孔獸牙懸飾。白灰面有兩三重相疊的，每層白灰面下有紅燒土一薄層，面積也不大，僅一公尺左右，長度也僅一公尺餘，上面還有柱子穴的遺存。

青台遺址的上層時代，和點軍台早期墓葬的時代相當，比點軍台的居住遺址稍早。點軍台第(二)號墓葬所出土的殉葬陶罐，在青台的上層文化裏也有出土，也有用作甕棺的。在青台遺址中，沒有發現過鬲足，方格紋陶片、蚌刀、蚌鋸、三稜骨鏃等物，也沒有龍山式的黑陶如斝、直筒杯等類。但在上層裏，出土的灰黑陶也不在少數，而且有圈足器，或許是表示受有龍山文化徵度的影響。青台下層（卽第六層）所出土的紅陶片比較多，時代也應當更早，但和上層是相連接的，似乎是同一文化的不同階段。

三　仰韶村的發掘

仰韶村在澠池縣城北十五里，處在黃土台地上，高出海拔約六百公尺。村子的東西兩側是兩道深達四五十公尺的深溝，叫做東溝和西溝，溝底還流着很小的溪水，這兩道溝在村南約里餘的地方會合為一。而遺址的所在地就在兩道深溝相會合的三角形台地上。可能是史前人類為了用水方便就定居在靠近流水的地方。現在的溝固然相當深，但在仰韶期時可能要比較淺一些，經過幾千年來的沖刷浸蝕作用，遂造成像現在這樣的深度。遺址的範圍相當廣汎，南北長約九百公尺，東西長約三百公尺。

安特生在一九四七年所發表的「河南省的史前遺址」附了一張一百六十公尺長的大路旁面側壁上所顯露的地層剖面圖，我們用它和現存的狀況比較了一下，雖然經過了三十多年的風雨侵蝕，但損壞的情形並不嚴重，他的原圖並沒有多大錯誤。

我們到仰韶村工作的時候，已經是七月初旬了，有加緊結束工作的必要，就特別選擇了一處灰層較薄的地方來做小規模的發掘工作，但是對路旁的灰坑（安特生測繪剖面圖的地方）則完全沒有加以擾動，我們仍要留給後來的人來觀察與批判。

我們在安特生所作的第五地點附近，開了一條長二十公尺，寬兩公尺的探溝。地層情形大致相同，也比較簡單。

第一層為地表耕土。出土物以灰陶為主，陶器文飾有繩紋、籃紋、方格紋等。彩陶片僅一二片。其他有有孔矩形殘石刀一。

第二層為灰土，陶片以灰陶為主，器物有鬲腿、鼎足、杯、罐等碎片，有一個杯形有流器，底部殘缺。也有少量的紅陶，至於彩陶片僅僅二三片。在石器出土的有一有孔石刀、小石錛，打製石器、泥造彈丸、陶環殘片等。在這一層僅遇到一個小灰坑（灰坑一）但很淺。但向下就是第三紀紅土。這裏文化層的厚度不及一公尺半，又無建築物遺留，可能不是原來的堆積，而是一種再堆積。但是彩陶和龍山式陶器共存是似無問題的。

我們在探溝的A段裏發現了九座墓葬，在B段遇到了安特生掘到墓葬過的舊探溝。他認爲這些墓都是仰韶期的墓葬。這些墓葬都沒有殉葬品，而且都打破了灰層，沒有被壓在灰層下面的。埋葬的方式也都是一致的。他們是頭向西南，兩脚相疊。這種葬法和現代仰韶村人的葬法很有些相似。現代墓葬是頭向飛山（東北）脚向熊耳山（西南）。而我們所發現的這些墓葬，頭脚換成了相反的方向，這種相似恐不是偶然的。所以這些墓葬，很像是有風水迷信以後的葬法。無論從地層上或葬法上都不像是早期的。步達生（D．Eeack）的仰韶人骨研究，是把這種墓葬也歸入其中的，他的結論，自然也會有若干問題存在的。

我們爲了爭取時間，爲了比較探溝的地層是否可靠，又選擧了一處梯田崖頭上所露出的灰坑（灰坑二）加以發掘，它的大部分已經崩塌了下去，殘餘的部分還不到一半，是標準的袋形灰坑，口小底大，口徑一．七公尺，底徑二公尺，深一．八公尺。坑內塡灰綠土，無層次可分，好像是一個時期的堆積。陶片也是以灰陶爲主，有少量的紅陶。彩陶片和陶環殘片各八九片。石器有石刀和打製的粗石器。也有標準的龍山式黑陶。其中有兩片彩陶比較特殊：一片是在黑色陶片上繪有紅色的粗線和圓點，用手一摸就脫落，很像遼東貔子窩的塗彩陶。另外一片雖是彩陶，但器壁的折度很大，厚度又薄，有些近似龍山式的陶器形制。從灰坑的堆積情形來看，仰韶村遺址的文化更不成問題是彩陶和黑陶的一種混和文化。

安特生在最初發掘仰韶村的時候，所得到的彩陶數量並不多，不過他專門檢出了彩陶和特別的器物來發表，使人很容易發生錯誤的感覺，認爲仰韶文化是以彩陶爲主體的，同時安特生並且認爲它是彩陶文化的盛期。但現在看來，仰韶村遺址的文化，不但不是彩陶文化的盛期，而且不是純粹的彩陶文化。

四　豫西豫北彩陶文化的比較

自從安特生發表仰韶文化的學說，對中國考古學界起了很大的影響，但是他一九二三年發表的報告「中華遠古之文化」寫得很簡單，而且把不召寨和廣武，秦王寨等地所出土的遺物混在一起，因此中國學者對仰韶文化的性質發生懷疑，一九四七年安特生所發表的最後報告「河南省的史前遺址」中，雖然把這些遺物分別開詳密敘述，但是其中有很多是由村民手中收買來的，出土情形不詳。

繼仰韶文化發現以後，前中央研究院吳金鼎先生在山東省歷城縣城子崖發現了以黑陶爲代表的龍山文化，並且證明了它是和仰韶文化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種文化。一九三一年梁思永先生在平原省安陽後岡發現了三層文化的堆積，上層是小屯文化，中層是龍山文化，下層是彩陶文化，換句話說就是彩陶文化的年代較早於龍山文化，而且是不相混淆的。以後在安陽高井台子及濬縣大賚店都發現相同的堆積，因此中國考古學者對安特生在仰韶村的工作發生疑問，仰韶村可能是有兩個不同時代的堆積，被安特生誤行混在一起。同時安特生在他最近的著作中也特別强調他自已的說法，並且希望中國學者能到仰韶村去觀察地層的情形。

這次我們到仰韶村工作，主要的就是要觀察仰韶村的地層情形，結果雖然是和安特生的觀察一樣，彩陶和黑陶是混在一起無層次可分，但是却將他的結論，稍加修正了。證明仰韶村遺址的文化不是彩陶文化盛期，而是「仰韶」和龍山的混合文化。同時我們到不召寨調查了一次，那裏和仰韶村並不相同，根本沒有彩陶存在。由此證明了不召寨是屬於龍山文化，而安特生把它歸在仰韶文化裏，也是絕對錯誤的。

關於豫北史前文化的堆積情形，著者曾有親自觀察的經驗。一九五〇年春，著者參加平原省調查發掘團到安陽工作，著者曾在後岡以及高井台子作過小規模的試掘，觀察地層的結果，確實是和梁先生所說的那樣相疊着，特別在後岡一帶最爲顯著。

現在惟一有趣的問題就是豫西和豫北的史前文化堆積，何以會差得這樣多，這可能是由於地域性不同的關係。我們知道中國的史前文化，往往是含有豐富的地域性，縱是同時代的遺物，若隔得較遠，會完全不相同。即使較近，也會各有它的特性。

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於時代的不同；就是龍山文化進入豫西較早，所以和彩陶文化相混合，形成一混文化。但進入豫北可能是比較晚一些，所以龍山文化沒有和彩陶文化相混合，而完全代替了彩陶文化。當然以上的推論僅是一種假設，確實的證據仍有待於將來的嚴密工作。

總之，中國史前文化的頭緒繁多，問題複雜，決不是像普通人想像那樣簡單。今後需要在每個區域內都作了詳細周密的發掘工作後，才能相連起來。單靠着一兩個遺址來作結論，是最危險不過的。這一次的豫西考古，本來是以調查爲主要目的。以上所說的三處發掘工作，規模都是非常小的。但是我們已獲得了四十二箱的遺物，同時解決了一些問題。對研究中國史前文化上更給與了有力的線索。尤其是在工作上獲得進一步的經驗，更奠定了將來對史前遺址大規模發掘工作的基礎。最低在我們工作人員是感覺非常興奮的。

附記：這篇紀略寫成後，承蒙考古研究所惠予同意，允許發表，書此誌謝。

南昌教案

來新夏

（一）事情發生以前

自從清康熙末葉以後，天主教的傳教士們，接受了羅馬教皇所發布的凡「有與天主教不相反者許可，相反者俱斷不行」的命令後。（一）滿清朝廷爲防止這些傳教士作非法活動，就不許外人在中國傳教，這種禁教的期間大約有一百餘年，到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發生，侵略者便以「教」、「兵」、「商」三位一體的聯合力量衝開了中國這一扇關閉很久的大門，爲宗教的侵略者造了「轉機」。這三者之間的聯繫是「相倚以行而各互用」的，如中國「屈抑其教，必求以兵脅之」，而兵又須「商人之助其費」，等到「既發兵，則教與商俱退聽焉」。（二）這一種緊湊配合的情形正說明了侵略者是利用大砲兵船想輸送進來大批的侵略分子——傳教士到中國來，把一付鎖鍊殘酷的加在中國人民的身上，因此鴉片戰爭結束後，對於宗教的侵略也是侵略者不肯放鬆的一環，牠們得到了建立「醫館禮拜堂及殯葬之處」（三）的權利，而且如有中國人將這些建造物「觸犯毀壞，地方官照例教拘重懲」（四）。

侵略者並不滿足於這些，爲了更擴大自己各方面的權益，加深中國各種災難，便發動了可恥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果先後訂定了兩個不平等條約。就中法國侵略者則注意到「麻醉中國人民的精神一方面」，目的很明顯的是「在於造就服從他們的知識幹部與愚弄廣大的中國人民」（五）。所以盡量在戰勝之餘訂定有利於這種侵略的條文，首先在中法天津條約第十三條中規定說：

「凡奉教之人，皆全獲保佑身家，其會同禮拜誦經等事概聽其便，凡按第八款備有蓋印執照，安然入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務必厚待保護，凡中國人願信從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皆免懲治，向來所有或寫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無論何處，概行寬免（六）。」（七）

緊接着在北京條約第六條中規定：不僅將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諭所頒示的教堂舊址（改爲廟宇民居者除外）歸還外，還擴大到凡奉教者的「天主堂學堂塋墳田土房廊等件」都經過法國侵略者的代表——公使的手「交還奉教之手」（八）。並且又因在訂定北京條約時，清奕訢的弟弟奕訢曾請在北京近郊居住的羅馬教皇代表法國傳教士孟振生（九）担任譯員，孟就利用這個地位的便利，在第六條之後擅自私增「任各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一語。昏瞶的滿清政府代表奕訢也就糊糊塗塗的簽字承認了。自此以後，宗教的力量得到急遽的發展，便對中國展開具體地侵略搶奪：一方面以金錢「收買中國人民中間的無賴分子」（十）「吃教」，對這些人有的給「白銀四兩」（十一）。有的「給銀一百三十兩爲貿易資本虧折許復領」（十二）。傳教士們指使這些人借教的力量「訛詐善良包攬辭訟」以「魚肉鄉民」（十三），袒護這些人「鬥毆」，「戮殺平民」的罪行（十四）。以製造中國內部的不團與分裂，並且還可以利用這些人出面去勾通書吏，霸佔田產以奪取自己心愛的田產（十五）。另一方面傳教士們更進一步的由自己出面來擄掠，藉口歸還教產見「紳民有高屋巨室，硬指爲當年教堂，勒逼民間讓還，甚至將有碍體制之地及公所會館廟宇爲闔地紳民所最尊崇者，均任意索取抵給教堂，即或實係當年經教中人賣出，嗣後民間轉相售賣，已非一主，並有重新修理費用甚鉅者，教士不出價值，逼令交還，又因房屋偶有傾倒反索修理之費」的（十六）。這些假細正義的傳教士，就是如此來搶奪中國人民資財。不僅如此，傳教士們還干涉中國的內政、外交，（一八六〇年）並且更毫無顧忌的屠殺人民，勒索賠款；尤可痛恨的是大肆特務活動。這一連串不可勝數的罪行，激怒了善良的中國人民，百姓對於傳教士「均怒目相視，儆若仇敵」（十八）。凡是傳教士所到之處，常常由於傳教士自己所造的罪因，而發生了報復行爲——這就是所謂「教案」。「教案」，從鴉片戰爭起，尤其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到義和團反帝運動止，短短的六十年來，據現在所知道的就會發生過五十餘起，共發生的地區廣到廣西、貴州、湖南、江西、四川、台灣、河北、江蘇、福建、直隸、安徽、雲南、西康、山東、十四個省內，幾乎占中國之半。

這一些教案都是中國人民以帝國主義的血來償還中國人民血債的英勇行爲，其中南昌教案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

（二）南昌教案的經過

北京條約訂定的第二年卽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年）十一月間，法國傳教士羅安當拿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執照，乘船到九江。先派其副手廣東南海縣人方安之（據識者指稱方係江西撫州人）到南昌府衙門投遞照會，稱羅擬見江撫商洽一切教務，並稱已在省城快子巷新置育嬰公會一所，養有女嬰十餘人。十二月十八日羅卽到省以法國總理江西傳教事務的名義謁見江撫，呈交恭親王所與的咨文，內容係索賠吳城教堂，原來江西在天津條約訂定以前，本已有法人在省內各地如撫（臨川）建（南城）袁（宜春）瑞（高安）臨（淸江）吉（吉安）等處設立秘密教堂，在黑夜傳教，其中只有鄱陽湖兩岸的吳城鎮係公開設堂，設立已有多年，道光年間曾加修建，但卽爲當地知縣所燬，後又改設一區，復在咸豐五年爲彭玉麟率兵毁壞，改設龍王廟，當時因尙未訂約，暫作罷論，至是法教士羅安當卽據約提請賠還，當年，羅安當就在省城育嬰公會過年。第二次晉見時羅又改用法國代理全權大臣的名義，並把傳教的布告，命令地方官張貼，這一侵犯中國內政的行爲，立時在江西省人民中間起了極大的激勵，這種激勵的情緒是在等待事件的發生。

同時，湖南湘潭長沙一帶有些「吃教」的人聽說傳教士能依約來省，就「相與夸耀其事 以爲吐氣揚眉復見天日」（十九）的時機來到了，這情形深深的觸怒當地的人民，於是便印發傳單揭露傳教士種種不法行爲，說他們「藉宣講爲名，裸淫婦女」，而對「其他種種奸惡」亦「描寫盡致」（二十）。並另用歌謠圖畫方式宣傳。這一類宣傳品很快的傳入江西，恰巧正被親身體驗到宗教侵略的江西省人民看見，於是就由齊集在省城考試的生童們聯合了退休的紳士夏廷榘（翰林院檢討）劉長濤（甘肅臬司）等把湖南的斥教傳單連夜趕印數萬份；分貼重要地方，並發布行動的揭帖，決定在二月十八日（陽曆三月十八）打毁教堂，號召全省人民起來向宗教的侵略分子鬥爭。

在決定行動的前一日，卽同治元年二月十七日（一八六二年三月十七日）久受侵略者欺凌的中國人民點燃起反侵略的怒火，衆起拆毁快子巷專門從事殘害中國嬰兒女童的「育嬰公會」，並將平日恃教爲惡的吃教者住房拆毁數十間，次日夜間又將城外法國的天主堂及教士坐船一隻拆毁，並在追趕侵略者的途中在南昌以南進賢縣附近打毁了吃教陳姓數家。那披著僞善外衣的傳教士羅安當及甘心作侵略者走狗的民族敗類方安之都在人民怒潮中遁脫，經過九江到上海，由法國領事公使出面向滿淸統治者辦交涉，目的是想通過這墮落的政府來鎭壓中國人民可欽敬的義舉。

事情發生以後，滿淸政府在江西的最高官吏沈葆楨一面討好人民說：「夷人逞志於我久矣， 不虞吾民之藉手以報也」（二十一）。認爲是「二百年養士之報」，並且對事件的責任也做出很勇敢的樣子要「挺身任之」（二十二）。另一面却又向統治者侵略者聲明自己是「與該教士亦休戚相關」的。並進而爲宗教侵略作出具體的計劃說：

「使傳教士徐示以可信，而不強以邀信，久焉斷無不信之理」（二十三）。

但是這種兩面政策在那一貫主持投降政策的李鴻章之流看來，是覺得實屬不够盡興的，所以對沈同情人民的一面加以攻擊，李鴻章自己曾寫信勸沈不要如此做，而郭嵩燾更明確了投降主義者的論點說：

「所欲拆毁教堂者，無識之儒生耳。其附和以逞，則愚民乘勢，鈔掠爲利。民數聚則氣囂，氣囂則法廢，造意不同，而其足以致亂一也。君子不屑徇愚民之情以干譽，故法常伸而民氣以熙」（二十四）。

郭嵩燾很直截了當的說明了這種人民反侵略的火燄，不僅會燒燬侵略者的權利，而且也要延燒到滿淸統治者的封建體制（法廢），因此就主張以統治者的「法」來「整肅」人民的「正氣」。

這一些賣國賊彼此最後的協議，決定了喪權辱國的辦法：是「由官籌措五千金，俟羅教士抵潯時，解與九江道妥交，以爲賠償之費，凡百姓願賣之地，任憑羅教士自擇建造，以壯觀瞻」。（二十五） 可是法國侵略者並不滿意於這一餽贈，而提出了新的要求，據中西紀事記載說：

「連年各處被斷，及現在省城進賢兩處房屋器用經典等項，共計估值七萬兩，又欲索撫州門外之丁家山及九江西門外之琵琶亭空地，以備該國教士隨時建造房屋教堂墳塋之用，交羅安當承管」（二十六）。

這種無理的要求，對於官來說是可以「忍氣耐煩以保全和議」（二十七）的。可是遇到中國人民就用行動來教育侵略者的無理，所以在次年卽一八六三年，當羅方又乘船來省交涉接收時，人民就在「河干豎一大旗，禁止法夷入城，隨有拋擲磚石飛中其舟」的，侵略者趕快「解纜下駛」（二十八） 逃去。侵略者對人民力量的畏懼，是有力的幫助了事件的解決。

在這一次反侵略鬥爭中，優秀的中國人民，以高度的英勇和深度的判斷，確定了反侵略的正確路線。

首先對於侵略者的醜惡面目，不遺漏的予以揭露，淸楚的指出這勸人爲善的教士到南昌來的目的是：

「要奪我們本地公建的育嬰堂，又要我們賠他許多銀子，且叫從教的來占我們舖面田地，又說有兵船來挾制我們」。痛快的指出了侵略者的本質是

、「我們讓他一步，他總是進一步」（二十九）。而羅方等的具體罪行則是：「倡行邪教，煽惑愚民，甚至採生折割，姦淫婦女，錮蔽幼童，行踪詭秘」（三十）。並且還在教堂的院中掘出骨殖一包，更是殘害中國人民的眞憑實據，像這樣作惡多端的人是堅決的不爲中國人民所容留，只要有他們存在，中國人民「以後總不能安生」（三十一）。因此必須和侵略者拚命。

其次反侵略的中國人民對於滿清的官僚，並沒有抱絲毫幻想，他們深深知道官與民不是一體，很清楚認識和指出了「官」的本形說：

「官府紳士，總是依他（指侵略者）。做官的止圖一日無事，騙一日俸薪，到了緊急時候，他就走了，幾時顧百姓的身家姓命，紳士也與官差不多，他有家當的也會搬去」。如果依靠這些官紳，即最後的結果是：「受罪的都是老百姓」。（三十二）

因之，中國人民對侵略者鬥爭，主要是依靠組織自己的力量，中國人民不是唯武器論者，不像統治者看見外國船堅砲利便嚇血墮馬。以致身亡（三十三）。而是充分相信自己的力量，中國人民蔑視侵略者說：

「看他一砲能打死幾個人，只要打不完的，十個人殺他一個人，也都殺了」。（三十四）所以就號召大家組織起來，在發布反對侵略者的公啓中說：

「我等居民，數十百萬，振臂一呼，同聲相應，鋤頭扁担，盡作利兵，白叟黃童，悉成勁旅，務將該邪教斬除凈盡，不留遺孽，殺死一個，償爾一命，殺死十個，償爾十命」。（三十五）這種威武不屈勇往直前的戰鬥精神，正表現了中國人民的偉大。但是，滿清政府的懼外媚外已相沿成習，他們以「和議」爲惟一出路，以賣國爲不二法門，因此不顧人民的意志，賠償洋人「銀一萬七千兩」，而被中國人民憤怒的火燄所拆毀的教堂則「由教士領欵另向他處購造」（三十六）。這一件侵略者對中國的宗教實行侵略的行爲，就如此的做了一個可恥的結束！

（三）結束語

「南昌教案」裏那個以「善良的教士」的面貌出現的法國傳教士羅安當：有時是「傳教士」，有時和官府來往又是「法國總理江西傳教事務」和「代理全權公使」的身份，等到他的醜惡面貌被揭露出來以後，就由法國領事公使出面來辦交涉，來要求權利，甚至派兵艦來威脅，這難道還不夠說明侵略者與傳教士相互爲用的關係嗎？

「南昌教案」只不過是許許多多「教案」中的一個，在其前有貴州湖南教案，在其後有震動一時的天津教案以及一九〇〇年因宗教侵略而激起中國人民憤怒反抗的義和團反帝運動。這許多清楚的歷史事實很明白的證實了帝國主義是怎樣利用了宗教從事對中國的侵略，和藉此以挑起刦掠性的戰爭，一次次教案的發生，侵略者一次次的得到益處，即就從鴉片戰爭以後六十年來由教案而被掠奪去的銀子而論，粗略的估計就有庫銀一百八十餘萬兩，這些數字永遠烙在中國人民的心上。而侵略者却一直是在貪婪的繼續這一種他們認爲是「公正而神聖」的事業。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壯大和鞏固，無異對一貫長於侵略的帝國主義分子敲響了「警鐘」，很宏亮的告訴他們說：「你們的末日到了」，帝國主義分子們垂死掙扎是無濟於事的，成千萬熱愛祖國熱愛和平的中國天主教人士都自動起來，認清了帝國主義猙獰的面貌，要求革新，倡導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運動」。這種行動「決不是反對宗教的本身而是保障宗教純潔性免受帝國主義的姦污；這決不是違背信教自由，而是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免受帝國主義的刦持，這決不是排外的狹隘民族主義，而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保障信仰天主教的中國公民的愛國自由」（三十七）。

中國人民正給予堅持愛國堅持正義的天主教人士以極大的同情與有力的支援，共同努力，爲保障每一個中國人民都能眞正得到「信仰宗教自由」（三十八）的應享權利而鬥爭，爲反對帝國主義利用宗教進行任何侵略的陰謀而鬥爭。

（註）

（一）佐伯好郎：支那基督教の研究卷三羅馬教皇禁約

（二）（二十二）（二十四）郭嵩燾：養知書屋文集卷十致曾國藩論江西教案書

（三）于能模：中外條約彙編中美五國通商貿易章程

（四）于能模：中外條約彙編中法五國通商貿易章程

（五）毛澤東：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第一章第三節

（六）籌辦夷務始末卷五恭親王奏將「寬免」字樣改爲「革除」。

（七）于能模：中外條約彙編中法天津條約

（八）于能模：中外條約彙編中法續增條約

（九）比屋根安定支那基督教史第十六章略說：「法國傳教士孟振生（Josepl. Mavtial Mouly）嘗中法在北京訂立續約時曾在京郊居住，聽恭親王奕訢之請，參與訂約私增條文，並在當年（一八六〇年）十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南堂追悼侵略軍，爲侵略軍營葬和建立紀念碑，後又依北京條約索還在京教產，次年回法，得拿破崙第三召見，在中國賠款中提取巨額款項與孟爲在北京修建教堂之用，一八六二年帶修女教士來罪，安置在天津，還就是後來天津教案中的人物，自已又回到北京次第修建東南西北四堂」。又據范文瀾中國近代史稱當時作翻譯的還有另一個名叫德拉馬的神甫（Delamrre）

（十）羅得克夫：義和團記

（十一）（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六）（二十八）夏燮：中西紀事卷二十一

（十二）魏源：海國圖志。

（十三）（十四）范文瀾：中國近代史第八章

（十五）光緒二十二年總理衙門奏

（十六）（十八）總理衙門致各國議辦傳教章程

（二十三）（二十五）沈文肅公政書卷一同治元年十二月初五奏

（廿七）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與美公使談日本侵台灣

（二十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四）籌辦夷務始末卷十二沈葆楨附呈派員密訪問咨

（三十）（三十五）籌辦夷務始末卷十二沈葆楨附呈江西選名揭帖撲滅邪端異教公啓

（三十三）薛福成庸盦筆記卷二藝臣憂國

（三十六）沈文肅公政書卷二同治二年六月二十日奏

（三十七）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七日北京光明日報社論

（三十八）共同綱領第五條

太平天國常熟守將錢桂仁發田憑幷跋

——蘇南新發現珍貴文物之一

周穗成

今年七月中旬「太平天國起義百年紀念展覽會」在蘇南區無錫市展出，成承蘇南展出委員會總幹事（蘇南區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陳毅岑先生暨副總幹事何人俊先生之邀請，主持宣敎工作。在蘇南展出期間，由於各地群衆認識提高，重視革命文物之保管與搜集，其中多數群衆或將棄而不問之歷史文物報請政府收存；或將珍藏在家多年之寶貴文獻，慨贈政府，其有益於人民革命史之研究，實非淺尠。通過此次展覽會，蘇南地區發現珍貴文物多件，如常熟「田憑」、吳江「蕩憑」無錫「錢糧執照」「門牌」及棄於龍潭之帝國主義的鐵砲，無錫趙景賢鐵砲等，均爲國內外尚未發現者。此項文物，足資考見有關太平天國之制度，及中外反動派破壞革命之事蹟，其價值可以想見。除龍潭洋砲由羅爾綱先生親自考證外，謹將其餘所發現之「田憑」「蕩憑」「錢糧執照」等珍貴文物，逐一介紹於後，以供學術界之參考。惟限於時間，未能深入研究，闕漏與訛誤之處，尚乞讀者指示。至於新發現之濤人筆記原稿本，亦在本刊逐一發表，俾供研究。

穗成謹識於無錫蘇南文管會 五一・九・九

田憑

忠王李 為

發給田憑以安恒業而利民生事今據

潘軍中營高旅帥統下花戶陳金榮有自置 縣

田肆畝四分八厘分座落 都六 圖

地方每年遵照

天朝定制完納銀

米不得違悞所有自份田產並無假

冒隱匿等弊給憑之後如有爭訟霸佔一切情

事准該花戶稟請究治爲此給憑永遠存執須

至田憑者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壬戌貳拾年月日給

一、「田憑」的來源：右太平天國常熟守將錢桂仁所發空白「田憑」乙件（參閱封面銅版）、其來源：當展覽會開幕之前蘇南展出委員會與文管會登報徵求公私藏家出借太平天國遺物，七月十三日該憑原藏者之一李葆璋先生將憑付郵寄會，並徵得共有者馮錫圭先生之同意送贈政府永久保存，李先生於函中說明此憑之來源：

公元一九四一年，我因事過蘇，遇馮君錫圭，枯澀無事，同作徜徉閑遊，忽見骨董肆中此憑陳焉，遂與馮君商議，共同購之（蓋因兩人共相競購，轉恐店主居奇）而歸。自後此憑即廢藏吾家……此次見蘇南文物管理委員會主辦太平天國百年紀念文獻展覽會，我以爲此物有關革命文獻，與其爲個人所秘藏，毋寧供諸於人民，即一面致函會中，願以供獻外，同時復以此情通過馮君，蒙首肯，遂於七月十三日以快函寄會。

李馮兩先生願將個人珍藏之革命文獻，捐贈政府，供諸人民，其精神實可欽佩。

二、「田憑」相當於今之「土地證」爲當年天朝政府發給人民之土地所有權證，人民執有此項憑照，才證明憑上所開列之土地，其所有權屬於自己，旁人不得侵佔，憑上有：「給憑之後，如有爭訟霸佔一切情事，准該花戶稟請究治，爲此給憑，永遠存執」等語，可以證明。

大概情形，太平軍凡克復一地，肅清殘「妖」（動反之滿清官吏兵勇）選舉鄉官，建立地方政權之後，即舉行土地編查工作，製造田畝清冊，頒發「田憑」，然後照冊征收「銀米」。吳江發現之「蕩憑」（見拙撰：「蘇南新發現珍貴文物之二」）上稱道：「緣我天朝恢疆拓土，十有餘年，所有各邑田畝，業經我忠王操勞瑞心，頒發田憑，盡美盡善，」此曾書明頒發「田憑」之事，並言在蘇浙新光復之區，於一八六三年前已核發完竣。其經過情況革命中上期於天京上游各省，有張德堅：「賊情彙纂」，儲枝芙「皖樵紀實」諸書之記載；革命後期於蘇浙一帶，除有忠王李秀成親筆自傳可供參考外，當有時人趙偉甫：「庚申避亂日記」，沈梓：「避寇日記」（註一），顧汝鈺：「海虞賊亂志」暨官修「太倉州志」等書之載述，詳情請參閱拙撰：「太平天國黃祠墓田憑跋」（註二）此處不贅。

發現「田憑」已屬二次，早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間，李根源先生於蘇南區無錫縣之蕩口鎮地方，獲有太平軍無錫，金匱兩邑中期守將乾天義李愷運所發「黃祠墓田憑」乙件，詳見拙撰：「太平天國黃祠墓田憑跋」（註三）。（其頒發者之姓名，職銜，前因根據照片，未能識辨，此次展覽會借到原

物，雖亦以印文模糊，辨認困難，然與本會近在無錫發現之太平天國壬戌拾貳年尙（上），下忙「錢糧執照」兩件對照研究，知爲曾任太平天國破㥪軍主將忠王宗弟乾天義李愷運所頒，特此補正前缺，詳情容在拙撰：「蘇南新發現珍貴文物之三」——「太平天國過繳記、吳凝林、吳公祠錢糧執照並跋」一文中再行研究，故本件之發現，是爲第二次。

根據原藏者李葆璋先生之說明，本件雖購自蘇州「骨董肆」，然察其頒發者爲太平天國愼天安（卽後來之比王）錢桂仁，可知出在常熟，昭文境內無疑（因桂仁爲太平軍常昭地方守將）。所以關於本件之研究，祇限於常昭兩邑之範圍。而「田憑」之性質，在拙撰：「太平天國黃祠墓田憑跋」一文中已有詳細之介紹，此處亦就本件本身之情況，作一簡述，餘不多論。

三、溯自一八六〇年（太平天國庚申拾年，清咸豐十年庚申）初夏，太平天國天朝九門御林忠義宿衛軍忠王李秀成會同諸將，徹底擊垮包圍天京，阻碍太平軍向下游發展達七年之久之滿清「江南大營」之後，又啣天王之命，親率雄師，乘勝東進，自克常、錫、直入蘇、嘉，一時蘇南，浙北各郡縣，盡入天朝版圖，常熟，昭文（前清分治，入民國巳併爲常熟一縣）亦於是年九月十六日（天曆八月初七日，清曆八月初二日）獲得解放！

本來克復常、昭之師，爲太平天國定南主將擎天義黃文金（卽後來之堵王，俗稱「黃老虎」，因其作戰英勇也。）佐將營天義李遠繼（後功封佑王），至十月十一日忠王李秀成以黃文金「統下擅違限期，不先申稟，令回安徽蕪湖，以忠殿承宣慷（實爲「愼」字之誤，詳見下文考述。）天燕錢桂仁代守常熟、昭文、限本日交割（卽辦理交接之意）。英王陳玉成亦派詳天福侯得隆來監守。民事歸錢，軍令屬侯」。（註四）

又常熟譚虛雲：「常熟記變始末」（註五）一書亦載稱：

先是常熟旣陷，僞忠王李秀成調黃文金竄江西，遣賊將錢桂仁來守常熟。

由此常熟，昭文兩邑之防務，遂改由錢桂仁接長，至一八六三年一月十七日（天曆壬戌拾貳年十二月初六日，清曆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常昭爲桂仁部將駱國忠肇叛變擧而降於滿清（時桂仁因公赴蘇，其本人不在常熟）爲止，前後凡兩年有奇，太平軍常昭守將，皆爲桂仁，錢於一八六二年初雖曾一度從忠王出征浙江，並隨歸王鄧光明等鎭守杭州，然不久仍歸常熟，彼旣掌理「民事」，故本件蓋有彼之官印，因此可以斷定本憑確係出於常昭地方。該憑原藏者之一李葆璋先生所稱：

又聞另有他人所珍藏之田憑（成按：似係李根源先生所發現今藏蘇州振華女中之蕩口「黃祠墓田憑」）有縣名塡明者，……本憑所註潘軍、高旅、屢欲查考，冀得其名字及駐地而未得，尙望多聞博古之士指教之。

一事，可以解決矣，惟所稱憑上塡註之：「潘軍、高旅」，四字確實無從考查，蓋此等文字係不明天朝制度之骨董商或以前之收藏者所任意塡寫，詳情容後考述。

講到錢桂仁後期之事蹟，當叛徒駱國忠等擧常熟降清時，彼適在蘇州，後又奉忠王之命，南下出守杭城。當一八六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杭州失陷時，降於滿清，自後卽任滿清都司，一八六六年一月十日錢隨滿清提督高連陞，總兵劉清亮等追擊入粤之太平軍餘衆，被康王汪海洋，偕王譚體元等擊斃於廣東嘉應州（今梅縣）之鳳寨。桂仁原名「貴仁」，參加革命後，避西王蕭朝貴之名諱而改，故降清後，復名「貴仁」。桂仁以堂堂王爵，變節降敵，僅得都司之職，反戈殺害同志，終爲擊斃，觀其下場，可爲反革命者戒！

四、太平軍解放常昭，一如克復他邑，於選擧鄉官，建立地方政權之後，卽進行整理地籍，頒發「田憑」。而自桂仁接任常昭防務，尤盡力推行天朝政令，時人顧汝鈺目睹太平軍之活動，較有詳細記載，不惟可見桂仁在常昭一帶之工作情況，亦可進而考見太平軍之一切地方設施，茲擇要摘引於下：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後）以昭文地界分前、後、中、左四營；常熟地界，分前、後中、右四營。每營一軍師（「帥」字之誤），五軍師（亦爲「帥」字之誤）二十五旅帥，一百二十五卒長，六百二十五兩司馬三千一百二十五伍長。軍帥請當地有聲價者充當，帥帥以書役及土豪充當，旅帥、卒長以地保、正身、夥計分當，惟兩司馬、伍長硬派（當）地着中殷實者承値，凡有役賦不完結者，都責任他身上。

出僞示，着旅帥、卒長，按田造花名冊，以實種作准，業戶不得掛名收租，各分疆界。起房捐，店捐，開張者領店憑（似爲「商憑」，詳情請參閱拙撰：「太平天國黃興和商憑跋」）（註六），有船者領船憑，水陸要路，立卡收稅。封攻樹、宅樹充公用，各手藝當差。居民留髮，如有一項違示者，定按軍令。完現年漕米，補完現年下忙銀兩，限到年一併清割。幸是年秋收大熟，各項皆能依示，惟收租度日者，及城中難民無業無資者，甚屬難過。

次年（一八六一年）二月，錢、侯二逆懸牌，於三月三日考試文武生童，發僞札，飭各師旅帥，每師名下選考文者五名，武者一名。李賊奴每日啓予一次至五次，不應，乃轉請王姓土豪具札來勸，予遂作書以絕之。

四月間，幼弟渭清梅里歸來云：今番白茆東岸，因每畝辦折紅粉七十文，紅粉者，火藥也。

五月，時有蘇州衛十餘人到陸家市來收軍租，夜宿星多廟，傳軍催按額清還。

　　同治元年……二月……分派統下頭目散往各鎭，將廟中神佛像移置別處，大殿改作天父堂，排書案，纛毛執刀列兩行，拘農民，具限期，每畝賦役折價，漲價至二千零六十文。（註七）

五、憑高三〇公分，寬二七公分，以白色之連史紙刷製。其憑文除字號縣名、所屬軍營旅帥番號、花戶姓名、畝數及其座落都圖、發憑之年月日等、係臨時用墨筆塡寫者外，其餘文字皆爲木刻正楷字，早就刻印於憑照上。

本件原爲一張空白之憑照，所註軍爲「潘」、營爲「中」、旅爲「高」、花戶爲「陳金榮」、田爲「肆」畝「四分八厘」、圖爲「六」及辨認不清之號數等字，則爲後來之骨董商或早期之收藏者所任意亂寫。蓋天朝定制，勿論軍中，或爲地方，其軍、師、旅、帥之編制番號概爲「前、後、左、右、中營」，而未採用軍旅帥首長之姓氏，如本憑所安塡之「潘」、「高」諸字樣者，其制詳見張德堅：「賊情彙纂」卷四：「僞軍制上」其中：「僞太平軍目式」一文。天朝建立地方政權，對社會編制，亦採行此制，即所謂「守土鄉官制度」（同見前書所引一條），是也。如「黃祠墓田憑」上註：「左四軍中營」、「黃興和商憑」中塡：「右四軍師帥」。故一望可知本件所書、「潘」、「高」兩軍旅帥之番號文字，決非當時所塡寫，實爲後人所亂塗。倘當初塡明其番號，至今根據顧汝鈺：「海虞賊亂志」一書之記載（見上引顧氏所述昭文、常熟太平軍地方編制之番號），卽能進一步考出本件出於常熟抑或昭文地方矣。

六、憑上有兩印，皆朱色：一爲常昭守將錢桂仁之大官印，蓋在左邊年期上。印高約二〇・五公分，寬達一一・五公分，文曰：「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開朝勳臣愼天安錢桂仁」，單行，宋體扁字，邊爲單龍捧日花紋，悉符天朝璽印制度。

本憑之發現，可知錢桂仁之爵位，在太平天國壬戌拾貳年（一八六二年）發憑時爲「天安」。考太平天國「天安」係王爵以下至侯爵之六等（義、安、福、燕、豫、侯）封爵中之第二等爵銜，其首一字自始至終不易，如李秀成在未晉爵「忠王」前，累功由「合天侯」上升至「合天義」，是故有載記錢桂仁爲「慷天燕」、「慷天福」者，如汝顧鈺：「海虞賊亂志」等書，均屬錯誤。蓋當時此輩反動文士，或得之傳聞，或未能詳辨其印文，如「慷」字與「愼」字筆劃頗爲類似，草率從事，故有是等之錯誤。本件之發現。可糾正文獻之誤植。桂仁之事蹟，已簡略如上文所記，此處不贅。

二爲忠王戶部尙書李生香之官印，鈐蓋於右邊「字第號」上，係騎縫戳，僅半邊，祇知高爲二二公分，印文中爲雙行小字，亦因祇剩半邊之關係，本件僅見：「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師忠殿戶部尙書李生香」諸字，根據李之全銜右邊所缺者，似爲「開朝勳臣護國軍」諸字尙隱約可辨）七字，因此其官印之全文應爲：「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開朝勳臣護國軍師忠殿戶部尙書李生香」等字樣。按「忠殿戶部尙書」郎忠王（李秀成）殿下總管錢糧財政機關之首長。天朝定制，諸王皆設六部尙書，分別處理吏、戶、禮、兵、刑、工六項事務，儼然小朝廷，亦天朝之特殊建制。

近察「黃祠墓田憑」右邊亦蓋有李生香之官印（前以未睹原物，故未詳其印文，今補正於此。）左邊則無錫，金匱守將李愷運之印信，因此，對照研究，可知太平天國「田憑」之頒發，權在郡縣之上大行政區（或省）之長官如東南太平軍之首長忠王，而主其事者則爲戶部衙門。決非各縣之守將如無錫、金匱之李愷運，常熟，昭文之錢桂仁等此可任意塡發，根據印文之研究，可以證明。所以吳江發現之「蕩憑」（請參閱拙撰：「蘇南新發現珍貴文物之二」），上有：「所有各邑田畝，業經我忠王操勞瑞心，頒發田憑」等語。

再細審二件「田憑」之木刻字體相同，係出於一人之手筆，可知同爲忠殿戶部衙門所印製。惟詳察二件「田憑」之文字，有數字之筆劃相異，知非同一刻版，而査「黃祠墓田憑」「字第××號」上淸晰地留有「丿」知爲金匱縣之「金」字之殘餘，蓋黃祠墓之祭田憑上註明位在金匱。本件之右邊雖已殘破，然仍見有「亻」字樣，（因模糊關係，「亻」樣亦幾難辨認）。似爲發憑者——錢桂仁「仁」字之半邊。由此可知天朝之「田憑」，各邑有各邑之字號。其印發之過程，大概由郡縣以上行政區首長之戶部統一刻製，各註其字號。鈐蓋（騎縫）戶部印信，發交各地方首長照冊塡明，再加蓋其官印於年期上之後發給人民。太平天國制度之嚴整，處事之有條理，於此又得一有力之物證。滿淸反動派所指爲「流寇」「賊匪」等誣罔之詞，可一掃而空矣！

七、李生香之事蹟，官私載述不多，一八六一年後知爲充任忠王李秀成之戶部尙書，並拜爲「護國軍師」，曾隨忠王出征於蘇南一帶。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日，從忠王、侍王等守無錫東鄉梅村地方時，不幸兵敗，爲滿淸總兵郭松林所俘，忠貞不屈，從容就義。實表現革命者崇高之氣節（註八）。

綜觀上文制度、人事、印信等之考證，再與「黃祠墓田憑」對照研究，本件確可斷定爲太平天國之眞實文件，而「田憑」之發見，尙爲二次，國內外僅此兩件，能不寶諸！

註一：近始發現之太平天國重要史料，該書爲原稿本，尙未刊行，成根據羅文綱先生之摘引。

註二：史學週刊（進步日報／大公報）第十一／十三期，文載一九五一年三／四月二十三／六日出版。

註三：同註二。

註四：顧汝鈺：「海虞賊亂志」。

註五：「逸經」文史半月刊第三十二期，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日出版。

註六：史學週刊（進步日報／大公報）第十二／十五期，文載一九五一年三／四月三十／二十一日出版。

註七：所撰：「海虞賊亂志」。

註八：施建烈：「紀縣城失守克復本末」卷三。

問題解答

問：黃河河道至今曾有七次變動？各在何時？各從何處入海？（古冶灤小董志中）

答：黃河改道，平均每四十年一次，問題所問七次變動，可能是指歷史上七次最大的變動，但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八年的變動，史籍不載，是爲第八次。又第一次「禹河故道」有不列爲改道的。今述如下：

第一次 紀元前三千年，「夏禹時代」，從孟津附近經榮津東北流入河北邢家灣附近的大陸泊和北魚地方的寧靜泊，經子牙河上流的滏陽，從子牙河流經天津入渤海，是謂禹河故道。

第二次 紀元前六〇二年（周定王五年），在宿胥決口，東行濮川、滑臺、黎陽至長壽津，再東行經戚城、元城、貝丘、德州、成平、合漳縣，復歸禹河故道，經浮陽、參戶，至章武入海。

第三次 紀元十一年王莽始建國三年，在魏郡決口，在清水河以東氾濫，至山東德州、濟南、千乘經徒駭河從山東利津入海。

第四次 紀元一〇四八年（宗仁宗慶曆八年），黃河流經河北的濮陽縣，轉入縣城東北的商胡，經山東東北部的臨清縣，由南運河經天津入海。

第五次 紀元一一九四年（金章宗明昌五年）在陽武（博浪）決口，至開封，東北流入山東西部的菏澤（曹州）至梁山縣，分二支：一、北支沿現在的河道入海。二、南支入運河取道淮河入海。

第六次 紀元一四九五年（明弘治八年）築斷黃陵岡支渠，大河正流，奪汴入泗合淮，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北支」遂絕。

第七次 紀元一八五五年（清咸豐五年）在河南銅瓦廂決口，泛濫兩年，入海河道沒有一定，後經「北支」入海。

第八次 一九三八年六月六日國民黨蔣匪帮在河南中牟縣西北花園口扒堤放水，使河南、安徽和江蘇兩萬九千方公里的肥沃土地遭受災害，受難人們六百一十三萬五千人，三十二萬五千人淹死，每年損失麥、稻、糧食約一百四十七萬噸，棉花二萬二千五百噸。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蔣匪帮在美帝支持之下，以黃河歸故爲藉口，實行以水代兵來淹解放區的陰謀，從一九三八至一九四八，敵僞和國民黨蔣匪帮統治期間，黃河改道，或由「南支」入海，或由「北支」入海。

問：現在長城是何時建造？古長城的遺跡在今何處？（古冶灤小董志中）

答：現在的長城多半是明朝建造的。長城的建築，始自春秋。戰國時，齊、楚、燕、趙、魏、中山、秦等均先後建城。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修接舊有長城，這就是所謂「萬里長城」。後來兩漢、北齊、北魏、後周及隋各修繕了一部。至明朝，重修全城，作爲北疆邊防。齊長城在山東境，在平陰縣與諸城之間，大約在春秋時建造的。楚長城在河南葉縣境，也是春秋時建造的，遺跡已不可考。魏長城分西段和南段，西段在陝西華縣沿北洛水而北直至綏遠的固陽。南段在河南原武縣與密縣之間，大約在戰國時建造的。趙長城在趙武靈王時期（紀元前三二五——二九八）造的，城址在寧夏東北部東向至張家口與北京之間的山地。燕長城在紀元前二九〇年左右建造的，燕北長城是沿着熱河山地的北麓走的，從察哈爾省懷來縣治的造陽到遼寧遼陽縣北襄平之間共長千餘里的長城。燕南長城起自河北省易縣西南至河北文安縣附近。秦長城是在紀元三〇六年至二五〇年秦昭王時期建造的，自甘肅的洮河谷北至黃河，然後沿黃河至寧夏的草原與農業交界的地區，再從寧夏折向東南，繞鄂爾多斯之南而達黃河。中山長城在趙長城的東北，遺址大概在河北山西間。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接修各段長城，西起甘肅岷縣向東經過河北的山海關後，再向東北而達中朝接壤的地區。這就是最古的長城位置。問題中所問古長城遺跡，因無明確斷代，故不知是指那一朝「古長城」。在目的長城主線（紀元二百年至一六四三年）的北邊和西邊（南邊也有）都可找到長城的殘址，斷續零散，究竟屬於那一朝代，須現場調查方能斷定。在山海關向東北跨過遼河而達松花江邊，有所謂「柳條邊」遺跡；在內蒙古南部和察哈爾、綏遠一帶，有所謂「蓄水池圍牆」；在東北的西部及西北部與內蒙之間有「土堆子」（例如「興安城」、「成吉斯汗城」等），還有橫過熱河山地之間的「土牆」，所有這些都可以長城視之，這都是遼金時代的防禦工事。（黎國彬）

代郵：

廣州白鶴洞育才小學伍同志：來函收到，您的意見很好，我們預備增加這一部分內容，請您參看第二卷第六期編後記第一條，並請介紹編者一些典型的經驗來爲荷。

人民歷史教師對教育的基本認識

——試談中小學歷史教學法之一

何遠

一、教育的階級性

人是社會的動物，勞動創造人類，人能改造自然和創造工具。同時勞動是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在勞動過程中，開始和發展了教育。因此教育是人類社會生活特有的現象，也是人類營謀社會生活必要的手段。人是集體從事勞動的，人自降生後，立即投入一定的社會關係，不可能脫離社會而生活，只有社會的人而沒有孤立的人。要過社會生活，就必須有一套參加社會生活的本領，而這一套本領又必須通過教育才能獲得。

在原始共產社會時代，還沒有階級，人們直接參加共同勞動。兒童、少年、青年男女他們模仿和服從於成年人，從而獲得培養他們生活上的技能。因此生產技能，生活習慣，是在參加社會生活所獲得的教育。在這種情況下，既沒有學校，也沒有固定的教育場所，更沒有專人作教師。在這個漫長的時間內，沒有階級，沒有剝削，所以這個時期的教育，是一切兒童和青年，經歷了同樣的生活教養。社會既沒有階級，在這個沒有階級社會裏的教育，也是沒有階級的。這個沒有階級的教育，可以叫做萬人平等教育。不過這個時代生產力很低，內容很簡單，因此教育還處於低級的形態。

由於生產力的發展，推動社會向前進步，人類由原始共產社會發展到奴隸社會。「自從社會劃分爲奴隸主和奴隸二階級而形成的奴隸制社會時起，教育就成爲特殊的機能，就是說，出現了專門的人員，甚至專門的機關來開始辦理教育事務。」（註一）教育從奴隸社會時代起，開始表現它的階級性。奴隸社會是奴隸主所享有的教育，奴隸不過是會說話的工具。封建社會是地主官僚大人先生所享有的教育，也可以說是等級教育。資本主義社會是資產階級享有的教育，也可以說是階級教育。

人類從有階級社會開始，教育的目的、內容和組織直接依從於統治階級的要求。換言之即是由統治階級的利益所決定，也就是教育的階級性。所以把教育看成爲一成不變的東西，或者把教育看成籠統的所謂「造就人才」，都是錯誤的。

二、教育是階級鬥爭的武器

「迄今存在過的一切社會底（有文字可考的）歷吏，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註二）在人類全部的有階級的歷史中，「自由民與奴隸，貴族與平民，地主與農奴，行東與幫工，簡言之，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始終處於對抗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是隱藏，有時是公開的鬥爭。」（註三）這種鬥爭的方式是多方面的，工具是各色各樣的，而教育便是階級鬥爭武器之一。「其效果是決定於誰把它掌握在手中，用這個武器去打擊誰。」（註四）

在中國，三千年的封建教育，掌握在封建地主階級的手中，基本上施行所謂「倫常教育」，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目的在於使被統治者老老實實地作統治階級的牛馬，不要犯上作亂。標榜「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等等封建道德，以便使青年子弟作家庭的俘虜。弄一套隨時代而改變的統治工具——軍隊、衙門，鎮壓活人，又弄一套城隍廟，節孝祠……等迷信設施，使被壓者死也不敢反抗壓迫者，其他戲劇、風俗、習慣等都是如是，總之都是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的。

歐洲封建社會時代思想上的依靠是教會，教會幾乎獨佔了整個教育，另外還有武士教育，這兩種教育在內容和方法上雖有不同，但其基本精神，都是爲了鞏固封建制度的。使被統治階級無力作任何反抗，以便利封建領主的統治。

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當資產階級還在反抗封建統治的時候，曾利用教育作武器，和封建統治者作鬥爭，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如歐洲十四世紀時的人文主義教育思潮。不過，在資產階級社會中，先進的民主教育思想未能實現，其原因就是統治階級加以抵抗，惟恐眞正科學的寶貴知識的廣泛流行

會使羣衆革命化。尤其因工業發展而成爲一種廣大力量的無產階級挺身奮起展開尖銳化階級鬥爭時，在教育方面，統治階級就使之成爲欺騙麻醉人民的武器。向青年一代灌輸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思想，以守法、當兵、納稅作爲國民的天職。宗教也隨着變爲協助資產階級培養道德精神的幫兇。「學校完全變成了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工具，它徹頭徹尾爲等級的資產階級精神所貫串，它的目的是給資本家培養勤快的奴隸和伶俐的工人」。（註五）可是資產階級從來也不講教育是爲了自己。列寧說：統治者越利害的，說謊的本領越大。由此可以看出資產階級怎樣來欺騙人民大衆了。

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方面的反動傾向更變本加厲了。在法西斯曾經當權的國家裏，青年受着野蠻的和仇恨人類的教育。在德國，希特勒份子的黨是「世界上一切帝國主義者中最帶掠奪性和强盜性的帝國主義者的黨。」（註六）法西斯德國的青年教育，結果是使青年淪爲禽獸，培養青年的野蠻本能。當年德國是這樣，日本法西斯教育也是這樣，這樣就便於法西斯主義在國內的殘暴統治和國外的瘋狂侵略。但這樣野蠻侵略，已經被人民的力量所粉碎。

中國百年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一方面還保留着封建的傳統思想，具體表現在尊孔讀經。一方面加上些西方資產階級教育的皮毛，具體表現在「西學爲用」和「全盤西化」。同時帝國主義者們除開用軍事、政治、經濟對中國進行侵略外，並且還利用文化教育作武器，對中國人民進行殺人不見血的精神征服。宣揚他們資產階級的「民主」和「物質文明」，用宗教迷信來麻俾中國人民的思想。這種封建的買辦的奴化的教育，是完全爲封建統治者和帝國主義服務的，用之以統治和侵略中國，作爲危害中國人民思想的武器。

最後蔣介石集百年來反動統治的大成，把封建的、買辦的、奴化的、法西斯的教育推到登峯造極的境地。提倡所謂「新生活運動」，主張恢復中國固有道德，曲解五倫八德，目的在於加强封建統治。杜撰「中國之命運」，「把勞動人民看成至下」，「把民族看成至下」，「把國家看成至下」。（註七）僞造並曲解中國歷史，汚衊中國共產黨，反對民主政治，反對思想自由，完全是一種極端唯心的愚民教育。完全有利於「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反動代表在大後方所進行的特務教育」的實行。（註八）他這種教育「所採取對待青年的手段，是極端悲慘的，青年們純潔的心靈，沒有根據自己的生活和理智去選擇思想的自由。」（註九）「一切情形完全出乎有理智的人類思想之外，其殘忍陰謀和希特勒、莫索里尼、這些東西沒有分別，甚且過之。」而這樣的教育，是由當時蔣介石御用的國民黨中央特務機關、宣傳機關、教育機關、組織機關以及三青團部直接主持的。他利用這種專制、黑暗、屠殺、特務教育，施行反共反蘇反人民，大大幫助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四大家族的反動統治。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給全人類的歷史掀開新的一頁，也給教育帶來了根本的變化，由統治階級用以統治勞動人民的工具，變爲勞動人民反對統治階級的工具，由維持和鞏固統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變爲消滅階級，替社會主義培養新人物保障社會走向更高階段的必要的思想武器。蘇聯社會主義的教育是全民的教育，是科學的教育，同時更是現在世界上最美滿的教育。

現在人民的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的教育，已經開始變爲人民的教育，正朝向着社會主義的蘇聯教育的方向邁進。

依據上述各個社會歷史時代教育發展的分析，可以說明教育是社會的歷史的過程。在階級社會內，它是具有階級性的。在和社會歷史發展一起改變着的教育領域內，同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內一樣，也表現着階級鬥爭。（註十）

三、新中國文化教育政策

教育既然有階級性和戰鬥性，新中國的教育既然由人民所掌握，那麼人民教育就是全部人民解放事業主要陣地之一，是全部國家建設事業的組織部分，新中國的教育本身，就是政治工作。在反動統治當權的時候，人民教育，可以揭穿其陰謀詭計，可以孤立敵人，爭取友人；在反動統治軍事、政治力量基本上已經肅清的時候，可以肅清統治階級的反動的殘餘思想，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培養青年的一代，樹立科學的革命的人生觀。所以極個別的同志，忽略教育作用，對教育估價過低，不願從事教育事業，是不正確的也是極端錯誤的。

新中國文化教育政策的指導思想，是無產階級思想——共產主義思想。因爲共產主義思想是人類最優秀的，最完備的，最先進的科學眞理。又因爲「社會發展到了今天的時代，正確地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責任。已經歷史的落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這種根據科學認識而定下來的改造世界的實踐過程，在世界、在中國均已達到了一個歷史的時節——自有史以來未曾有過的重大時節，這就是整個兒地推翻世界與中國的黑暗面，把它轉變過來成爲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註十一）毛主席教導我們的話，雖然是前幾年說的，到全世界人類澈底解放以前，永遠是常新的。這種偉大而艱巨的歷史任務，通過教育來完成是有重大意義的。只有共產主義思想才能告訴我們

怎樣認識世界並給予正確的歷史觀；只有共產黨主義思想，才能告訴我們事物發展的規律並從而改造之；只有共產主義思想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才能告訴我們怎樣觀察問題，研究問題和處理問題。今天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教育，就是明天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教育的預備和基礎，如果不是以共產主義思想作爲指導原則，顯然是不可能完成任務的。一切農民階級的思想，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和民族資產階級思想，其不能作爲指導的思想，從中國革命歷史的實踐上，早已經事實上被確定了。

新中國文化教育方針「是新民主主義的卽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文化教育」。(註十二)所謂民族的形式：是反帝的，主張民族獨立和尊嚴的，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的文化略的：是尊重自己民族的歷史，熱愛祖國的；是中國氣派中國作風，爲廣大羣衆樂於接受的；是與國際主義相結合的；絕對不是妄自尊大，盲目排斥外來文化，也不是「全盤西化」以致喪失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所謂科學的內容：是反封建的，反對維護封建的統治秩序，反對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反對不講眞正的是非專講等級以致被帝國主義反動統治所利用。同時又是反迷信的，反對宿命論，提倡最先進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樹立科學的宇宙觀和科學歷史觀。所謂大衆的方向：是爲羣衆服務的，主要是爲工農兵服務的，爲人民教育事業服務的，向工農大衆開門的，普及與提高相聯系的，是培養工農出身的新型知識分子的。與過去毫無立場毫無原則的「平民教育」和「鄉村教育」，在本質上，毫無相同之處。

新中國的文化教育任務是：『應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爲人民服務的思想爲主要任務」。(註十三)人民民主專政是我們新中國建設的保證，要想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消極的一方面是肅清三種敵人的思想，積極的一方面是大量培養建設人才。實施思想政治教育，肅清殘餘的反動的舊思想，是前者必要的和先決的條件，肅清文盲，提高人民文化水平，是後者必要的和先決的條件。

四、人民歷史教師的任務

新中國文化教育建設，由於中國革命的成功，教育的作用，已經史無前例的增强了，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教育，不僅成爲可能，而且已成爲現實。毛主席教導我們：「隨着經濟建設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高潮」。毫無疑問，在文化建設中，教育建設將佔一個重要的地位。

人民歷史教師，是新民主主義文化教育的實際工作者，是共同綱領文化教育政策執行者，是青年一代的指導者，要想完成自已所負的任務，首先應該具有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我們每一個歷史教師，必須自覺地加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學習。因爲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從人類向自然和社會鬥爭中抽出來一般最概括的經驗和結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眞理。不僅敎導我們正確的認識世界，並且教導我們怎樣改造世界，這就是不僅使我們能够正確的思想，而且還能够使我們正確的行動。所以我們決不能脫離這種普遍眞理的指導，否則無論在思想上行動上都會發生錯誤的。

其次是加强政治理論和業務的學習。中國今天革命的偉大勝利，就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所以只有不斷的提高我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水平，才能具體的分析歷史，才能正確的講解歷史和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是單純的要求多讀幾本馬列主義和毛主席的著作，而更重要的是聯系自已思想從實際工作中多多體會，使理論和實踐密切的結合起來，把國家和人民的要求，同自己的日常工作緊密的聯系起來，才會收到效果，才能逐步提高。

第三要樹立無限忠誠於人民教育事業的專業思想，我們必須深刻地認識到國家和人民把未來新中國的主人交給我們教師來培養，這是表示國家和人民對我們教師無限的信任。如果我們眞正能够把青年一代培養成爲全面發展的人，成爲新社會的建設者和保衛者，進而承担起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歷史任務，這是我們教師對於人民和國家最大的貢獻，這是多麼光榮的事業！因此我們要有長期爲教育事業奮鬥的决心，要準備爲教育貢獻出自已的一切力量，爲新民主主義文化教育事業而奮鬥。

註一：凱洛夫：教育學。
註二：馬恩合著：共產黨宣言。
註三：仝上。
註四：斯大林：與英國作家威爾斯的談話。
註五：列寧全集
註六：斯大林：論蘇聯偉大衛國戰爭
註七：陳伯達：評中國之命運。
註八、九：同上。
註十：凱洛夫：教育學。
註十一：毛澤東：實踐論。
註十二：共同綱領第四十一條。
註十三：同上。

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的教學研究

——常州專區中等學校歷史觀摩教學的意見之一

秦和鳴等

前言

常州專區中等學校，曾於本年六月上旬舉行了一次歷史觀摩教學，本文是對私立常州正衡中學董蔡時先生在該校高三班所教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的觀摩意見，這些意見是根據董先生所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教案、講義和董先生向蘇南常州中學歷史教師張嘯琴先生所提觀摩意見等三個書面材料，以及聽取了有關董先生課堂教學的實際情況的彙報而寫成。

一 成績與收獲

（一）一般地能用正確的立場觀點來分析和批判歷史，使學生從歷史中吸取必要的經驗教訓，認識歷史的發展方向，如董先生講到希特勒匪軍席捲西歐、北歐，這些國家的反動政府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時，一方面指出反動統治階級的脆弱性，不能也不顧發動人民來抵抗侵略，對內鎮壓人民，對外必然是屈膝投降；另一方面又指出這些國家的人民在國土淪陷後起來作地下鬥爭的事實，這就可以加强學生對於國家政權性質和人民羣衆在歷史上所起作用的認識，從而使學生進一步明確對什麼人應該憎恨；對什麼人應該熱愛。

（二）一般地能够聯繫時政，滲透了思想、政治教育，如講到日本投降的主要原因時，董先生說這是由於蘇聯出兵東北，摧毀了日本的關東軍，而不是由於美國在日本丟了兩枚原子彈；又進一步聯系到今天美帝在朝鮮戰場上所投下的炸彈等於幾十個原子彈，而中、朝人民軍還在英勇地抗擊敵人並屢次戰勝敵人，證明原子彈不足畏懼，這樣可以進一步幫助部分學生消除恐美思想的殘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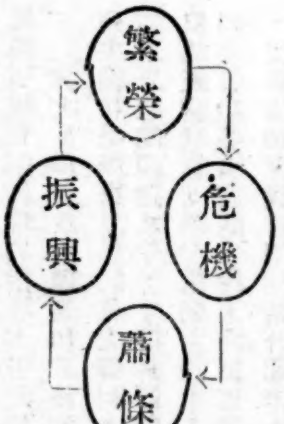
（三）準備充分，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的史料錯綜複雜，但董先生能够將它組織起來進行教學，並繪製了一些必要的地圖，以增强時空聯繫，這些準備工作，對教學效果的提高，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 改進意見

甲、內容方面

（一）關於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問題

董先生把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的規律，畫成這樣一個公式：



這個公式表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循環發生的，但是實際上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周期性運轉不是簡單的重覆和循環，而是一次比一次深化地發展着的。其間每經過一次危機，就意味着生產與資本的進一步集中，中小資產階級的又一次分化和勞動人民的愈加貧困化，因而準備了另一次更大規模的新的經濟危機；伴隨着經濟危機一次次深化的是資本主義國家對世界市場和殖民地的掠奪，將世界每處地方都納入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在社會主義的蘇聯出現以前），這個發展又轉過來使經濟危機帶上新的更大規模的性質。所以資本主義的周期性經濟恐慌的一般規律是：危機——→蕭條——→振興——→繁榮——→新的危機……而不是一次次的循環。

對於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本質，董先生也沒有加以詳細揭露，他說：「……爭逐利潤的競爭和生產的擴大就達到了最高限度，於是危機就發生了，整個周期又重新開始……」其實爭逐利潤的競爭和生產的擴大不是危機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在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性和佔有的私人性之間的矛盾，在這樣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矛盾的基礎上，資本家爲追逐利潤，一方面使生產量盲目提高，另一方面對工人加深剝削，這就在事實上造成與資本家意願

相反的結果，即商品市場的縮小，生產品過剩，這種情況發展到一定階段，就導致工廠關門，生產品大批毀壞，同時工人大批失業，生活日益貧困化，因而爆發了一次次的經濟危機。董先生僅僅說生產擴大是不能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本質的。同樣原因董先生對繼一九二九——一九三三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之後在一九三七年所爆發的新的危機，也就缺乏完整的說明，例如他指出這次危機的三個特點其中之一是：「危機主要是發生在尚未走向戰時體制的英美法等國，而德意日則因軍火工業膨脹，所以沒有受到波及。」在這裏，董先生只說明德意日軍火工業膨脹是不受經濟危機波及的原因，而沒有說明這是德意日主觀上爲欲掙扎出愈來愈緊的經濟危機的絞索的結果；同時也沒有說明自一九三八年起，意日兩國的生產降低過程已在開始，而德國也將走上意日兩國同樣的道路，這是一個重大的脫漏。這個脫漏可能給予學生一種印象，即經濟危機可以藉發展軍火工業來消除的，實際上德意日三國當時的一般情景是「把國內經濟轉上戰時經濟軌道，就是使工業循着片面的軍事趨向發展，極力擴大專供戰爭需要而與居民消費無關的那些物品的生產，極力縮小居民消費品底生產，特別是縮小居民消費品的出售，因而縮減居民的消費額，使國家陷入經濟危機。」指出這一點是非常必要的。

董先生對於經濟危機和戰爭的關聯，僅作一般的講述，他說：「這次戰爭，是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到不可調和的時候，不得不以武力向自衛力比較小的國家發動侵略。」這不但沒有講清究竟是什麼內在矛盾，而且更重要的是沒有講清從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以來增長起來的資本主義總危機對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決定作用，這是非常不够的。必須指出：在總危機條件下所發生的經濟危機的特別尖銳、持續、和間隔時間的愈益短促，以致像德意日等自認爲原料和銷貨市場較少保證的資本主義國家集團，往往要作變更現狀，並用武力手段來作有利於自己的再分割勢力範圍的圖謀，這樣就不可避免地要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

斯大林同志在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原因時說：「這次戰爭是現在壟斷資本主義基礎上各種世界經濟和政治因素發展的必然產物。」

因此，除了以上就董先生所講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世界經濟因素加以研究之外，下面還必須對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世界政治因素加以研究。

（二）關於對德意日法西斯國家的認識問題

董先生把法西斯的興起和强大看做主要是由於英美法的豢養這個外在因素的作用，他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法帝國主義的强大，遭了它（指英帝）的忌諱，於是（英帝）扶植德國，西則抗法，東則反共……希特勒……討價還價地鞏固了法西斯統治。」「侵略之虎（指希特勒）給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政客們（指張伯倫等）培養得既肥且大，精强力壯。」「希特勒是人，墨索里尼是人，東條是人，資本主義垂死階段的掙扎把他們造成了如此怪人，英美法帝國主義把他們當作反共能手，一心一意培植他們……」這種說法是欠妥的，雖然英美法等國的罪惡的綏靖政策曾經是縱使法西斯國家日益猖獗的重要因素，應該時刻不忘地對它進行無情的批判，但是歸根說來，這還只是對法西斯的興起和强大起着影響作用的因素，而不是決定因素，決定因素是德意日這些國家內部的經濟與政治的條件。由於這些國家的大資產階級主觀上爲要逃出經濟危機，爲要鎮壓工人運動和阻止革命的發生，在內政上開始依靠最暴烈的手段，公開建立最殘酷最恐怖的血腥專政，來鎮壓工人階級，在對外政策上，狂熱地企圖挑起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及勢力範圍的戰爭，這樣就走上了法西斯主義的道路。

其次，董先生把法西斯國家的侵略政策的決定，看作統治集團內部派系力量消長的結果，他說：日本「一九三八年九月的進攻張鼓峯、一九三九年七月的進攻諾門坎……認識了蘇聯的不可戰勝的力量之後，大陸政策派暫時銷沉，南進政策派（海軍派）抬頭，於是玩了偷襲珍珠港的把戲……」這樣說法，那麼爲什麼太平洋戰爭不在張鼓峯或諾門坎事件之後立即爆發，而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才爆發呢？很顯然，張鼓峯和諾門坎事件發生時，正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日本想乘蘇聯不備襲擊蘇聯，並以此作爲索取英美帝國主義的讓步，以便從速解決中國問題。這是日本在英美被困於歐洲情勢而有可能犧牲中國來滿足其利益這一條件下所採取的一種手段，所以差不多在同一時期，日本還曾對蔣介石反動集團積極進行政治誘降活動。必須指出：由於蘇聯及外蒙的軍隊打擊日寇的進犯，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全國人民積極抗戰，在這一時期開闢了許多敵後根據地，使中國大陸戰局轉入相持階段，堅定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情緒，日本這一個陰謀才沒有實現。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爲了配合歐洲德國法西斯軍隊的攻勢，並企圖掠奪太平洋中及東南亞的英美法等帝國主義所有殖民地的戰略物資，於是又掀起了太平洋戰爭。所以日本進攻張鼓峯、諾門坎，以及後來掀起太平洋戰爭，都是從它本身的經濟和政治上的利益出發的。日本國內的經濟和政治的條件是決定其對外侵略政策的主要因素，其餘因素都是次要的或從屬的。董先生把日本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看作是決定其對外侵略政策的主要因素，這也是欠妥的。

（三）關於對英美法等帝國主義國家性質的認識問題：

董先生對英美法等帝國主義國家的性質，認識是有些偏差的，他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民主和法西斯之間的戰爭。」這樣說法無異承認英美法等帝國主義國家和蘇聯一樣，也是民主國家，就恰恰上了資產階級反動理論的當，這些理論面對着蘇聯人民過着幸福生活這個無可置辯的事實，便捏造什麼「蘇聯祇是經濟上民主，而英美法等有着政治民主」等等說法來欺騙世界

人民。其實，沒有經濟上的民主，政治上的民主乃是一句空話；有了經濟上的民主、政治上的民主才是眞實的，可靠的。假如說英美法等國家內部有民主的話，那只是他們國內的資產階級在享受着這個民主權利，廣大勞動人民是沒有民主權利的。因此民主這一概念除了適合於蘇聯以外決不能包括英美法等帝國主義國家，應該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法西斯與反法西斯之間的戰爭，或逕稱爲反法西斯的戰爭較爲妥當。

其次，董先生對英美法統治集團的反動政策講解得不够明確，他說：「英法非但縱虎傷人，抑且害及自己，幹出身不由主的人類悲劇……」實際上，英美法統治集團，並非身不由主，因爲他們一貫執行着反蘇政策，要反蘇便自然要勾結與扶植德意日作爲其反蘇先鋒了。董先生又說：「英美在遠東的政策是幻想日本去反蘇。」其實，正因爲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侵略蘇聯已經不止一次，所以英美才要勾結，豢養它進一步去進攻蘇聯，而不是什麼「幻想」。董先生又說：「消滅打擊過英美的德日，是受着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指英美）軍略支配的，但是蘇聯要消滅反人民的法西斯，是受着社會主義制度的政略支配的。」在這裏，董先生把戰爭和政治機械分開，並企圖以此說明英美在「軍略」上要消滅德日，這也是不對的。因爲戰爭和政治根本不能分開，戰爭是政治的延續，是在特定條件下爲要達到某種政治目的所採取的手段；同時英美法等帝國主義的參戰目的，也不是要消滅德日法西斯，「在英美統治集團看來，參加反法西斯戰爭，並不表示放棄他們的帝國主義目的，而是表示他們不得已的暫時的僞裝。」像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間德國侵入荷、比、法之前，英法在西戰場那種「奇怪戰爭」，和幫助白匪芬蘭進行反蘇戰爭，以及大戰中遲遲不開闢第二戰場等事實，正是可恥的慕尼黑政策底邏輯的繼續，企圖反對蘇聯和削弱蘇聯。

董先生在說明英美法三國在大戰前的政治態度時，還有着前後不一致的缺點，例如他說：「英美法等國家由於周期性經濟恐慌的空前嚴重……爲了作垂死的掙扎，不得不向戰爭找出路……」又說：「英法想和平，那是爲了怕戰爭……」這兩種說法是不能統一的。其實英美法從來就是靠戰爭和榨取殖民地起家的，在當時，它們決不是眞正要和平，相反卻時刻想發動別國進行侵蘇戰爭。

（四）關於對蘇聯社會主義國家性質的認識問題

在講到德軍侵入蘇聯初期得逞的原因時，董先生說：「當時德國軍隊在作戰經驗和準備上是較蘇聯爲優勢的，所以初期閃擊，是得到暫時的勝利。」但是董先生沒有深入一步指出下列諸點，即：德寇在現代化的作戰經驗及戰爭準備上佔優勢，僅僅是暫時起作用的因素，而蘇聯反法西斯戰爭的性質，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和馬列主義軍事科學的指導，蘇聯人民的共同戰鬥和支援，乃是經常起作用的因素。唯其如此，所以蘇德戰爭初期，蘇聯才能有效地進行防禦戰，而在這個防禦戰中能够大量地折損了德寇的有生力量；唯其如此，蘇聯才能在大戰中最最困難的年代單獨抗擊德國法西斯，並在雙方力量的不斷消長到達一定程度的時候展開了大規模的反攻，直搗法西斯匪黨的巢穴，成爲世界反法西斯戰線中的領導和中堅力量。不指出這些，就不可能使學生完整地認識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

（五）關於使用名詞的嚴肅性問題

一定的名詞簡明扼要地反映着一定的具體事物，因此，使用名詞需要有嚴肅的科學的態度，而董先生在這方面也還不够注意，例如：

1.把蔣介石統治下的中國說爲「反動資產階級統治下的中國」，這是不妥的。假如說反動資產階級就是官僚資產階級，那麼也不够說明舊中國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者的聯合統治，我認爲旣然有着現成可靠的規定，那就不需要另外去創造名詞。

2.把英美法等帝國主義國家及其政府說爲「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及地主與資產階級統治的政府」，這也是欠妥的，國體和政體不能分開，不能說國家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而政府是地主和資產階級掌握的，實際上，英美法等帝國主義掌握政權的主要是資產階級，所以祇要說資產階級專政就行，董先生不僅加上了地主，而且還把地主放在資產階級前面，這就模糊了資本主義國家及其政權的性質。

3.董先生說：「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矛盾這個標題含義混淆，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仇視社會主義和反社會主義，因爲社會主義國家從來沒有去侵犯資本主義，相反的，倒有資本主義國家在一貫反蘇。」我認爲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矛盾這個標題是正確的，因爲自從蘇聯十月革命勝利之日起，世界上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就有了矛盾，這個矛盾在歷史發展階段上和世界範圍上總的方面講來是基本的矛盾（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還不是最主要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的一貫反蘇，其中道理也正是因爲兩者之間存在着根本矛盾的緣故。

4.董先生說：「德國法西斯的閃電戰對腐朽落後的統治階級與人民有矛盾的資本主義國家極著成效……」這樣把法西斯德國剔出腐朽落後的統治階級與人民有矛盾的國家之外，也是欠妥的。

5、把北朝鮮說成北韓，這也不對，過去反動派稱朝鮮爲韓國，稱三八線以南爲南韓，以北爲北韓但是全世界人民都祇承認金日成將軍所領導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南韓、北韓這些政治地理名詞在人民心目中並不存在，我們應該說南朝鮮或北朝鮮。

（六）關於使用語言的立場問題

講解歷史應該注意使用語言的立場，使講解內容到處滲透着思想政治教

育，以端正和加强學生們的立塲觀點：董先生有時能注意這個問題，例如德國法西斯軍隊作戰兇狠，只能說他們瘋狂，不能說他們勇敢等等，但是有許多地方却沒有注意，例如他說：「資產階級聰明絕頂，深知蘇聯是……因此希望反蘇和滅蘇。」「希特勒是理性而殘忍的野獸。」「希特勒麻醉了全國無知的人民。」「蘇聯的和平政策被粉碎。」「希特勒的軍隊，浩浩蕩蕩向蘇聯進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等等。聯系起來就會得到這樣的印象：帝國主義和法西斯勢力是如此聰明，如此有理性，如此聲勢浩大，而人民是如此無知，如此薄弱，那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反法西斯陣線憑着什麼取得偉大勝利就未免不可思議了。可以想見：不注意使用語言的立塲，教學效果也就必然要減少。

乙、方法方面

爲了養成學生獨力思考問題的能力，在教學方法上應盡力避免注入式，做到在教師掌握主導下師生共同活動。因此：

（一）教師應該有計劃地提出一些啓發性的問題，並隨時發現學生們所存在的問題來給以解答，董先生在這一方面做得太少；在他所提的少數問題中也很少是具有啓發性的，如「資本主義社會之後，是什麼社會？」學生不用思索就可以答出來。種樣的問題就不會有多少效果。另一方面，董先生對學生所提的問題也沒有予以重視和妥爲解决，如他講到「戰後所謂盟軍佔領日本實際上只有美軍，而沒有其他國家的軍隊」時，學生提出問題：「中國不也有一個軍事代表團駐日參加佔領的嗎？」董先生當時沒有給以確定的答覆，後來也沒有加以解釋，因此在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上，學生們仍舊是模糊的。

（二）教學過程結束階段的總結，應該由師生共同來做，這個總結，對教師來說，通過教學實踐，在教材的精神的掌握上提昇到更高的思想水平，對更進一步地接近學生的思想實際；對學生說來，從教學實踐過程中所吸取來的許多知識，初步地加以「概念、判斷、推理的改造製作工夫」，使感性認識的上昇到理性認識，進一步理解事物的本質。而董先生在結束階段却是由自己片面做總結，因此對學生們的幫助是不大的。其次在總結以後，做一張大事年表也是有必要的，這樣可以使學生經過整理、製作而鞏固所獲得的系統的史實和知識，並便於溫習和查考。

丙、教學提綱方面

董先生所擬第二次世界大戰史教學提綱，有許多地方過於簡略；個別地方比較紊亂，現在根據我的看法，將教學提綱試作編排如下：

（一）目的與要求

通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的教學，使學生認識：1、戰爭的勝或敗决定於戰爭的正義或非正義的性質，2、資本主義制度的沒落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3、人民力量的强大和帝國主義反動勢力之被削弱。從而提高愛國主義思想、加强必勝信心，爲反對新的侵略戰爭、爭取世界和平而鬥爭！

（二）教學步驟

1、戰爭的原因

（1）資本主義總危機條件下世界經濟危機的進一步發展；

（子）簡述經濟危機的一般圖景。

（丑）經濟危機的原因及其發展規律。

（寅）資本主義總危機階段的世界經濟危機——着重說明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及一九三七兩次經濟危機的情況及其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發生的直接關係。

（2）世界政治形勢的變化和發展。

（子）聯系着經濟危機的深化，簡述德意日法西斯主義的發展成長及其侵略中國、阿比西尼亞、西班牙、奧地利、捷克等國並結成軸心集團的經過，指出其目的是企圖重新分配殖民地。

（丑）英美法帝國主義執行罪惡的綏靖政策的經過，並分析其用意。

（寅）蘇聯執行和平政策之經過及其被拒絕的原因。蘇德簽訂互不侵犯協定的原因。

2、大戰的進行

第一階段——蘇聯參戰以前（一九三九年九月——一九四一年六月）；

（子）德國侵波戰爭——着重說明德寇的瘋狂凶惡及波蘭反動政府的腐敗無能，英法的空談援助，蘇聯收復其西境領土之必要性。

（丑）西線戰事和英法潰敗的經過——着重分析法國失敗的原因。

（寅）意、德侵入巴爾幹、北非的經過，並分析其用意。

（卯）簡述當時歐、非戰場形勢。

第二階段——蘇聯參戰以後（一九四一年六月——一九四五年八月）。

（1）德國發動侵蘇戰爭——

（子）簡述赫斯飛英陰謀並分析這一陰謀失敗的原因。

（丑）德寇侵蘇的原因和目的。

（寅）德寇侵蘇至斯城戰役前的戰爭經過——着重指出德寇有生力量的大批折損，以及蘇聯人民英勇抗擊德寇的愛國主義事蹟和精神。

（卯）蘇聯參戰的意義——反法西斯戰爭性質的加强和世界反法西斯陣線基礎的奠定。

（2）太平洋戰爭的爆發——

（子）簡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中國戰場上的形勢——着重指出蔣介石的投降危險和中國共產黨的堅持抗戰。

（丑）簡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英美和蘇聯對待日本和中國的兩種

不同態度。

（寅）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原因。

（卯）簡述日本在太平洋戰爭初期暫時得逞的經過並分析其原因。

（3）以蘇聯爲主的世界反法西斯陣線的結成——着重說明一九四二年元旦二十六國宣言「不與敵國單獨媾和」的內容，指出今天美帝包辦對日和約的非法和無恥。

（4）斯大林格勒的保衛戰——

（子）斯城戰役的巨大規模。

（丑）分析斯城戰役對世界大戰全局的關鍵性意義。

（寅）分析蘇德戰爭初期蘇軍暫時撤退、德寇暫時得逞和斯城戰役後蘇軍轉勝、德寇潰敗的原因。

（5）北非戰事結束、意大利投降的經過，英美遲遲不開闢第二戰場的用意。

（6）盟國合作的會議——

（子）簡述一九四三年秋世界大戰的形勢。

（丑）蘇美英三外長會議（一九四三年十月）及中蘇英美四國普遍安全宣言的主要內容。

（寅）中美英開羅會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經過及其宣言的主要內容。

（卯）蘇美英德黑蘭會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的經過及其宣言的主要內容。

（辰）盟國合作會議對戰爭形勢勝利發展的作用；另一方面聯帶指出美英帝國主義在戰後破壞這些國際協議的事實。

（7）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

（子）蘇聯紅軍的偉大攻勢及其勝利成就。

（丑）第二戰場的開闢及法國人民起義光復失地。

（寅）蘇聯一九四五年一月起的總攻勢，納粹臨死前的反蘇陰謀、德國的投降。

（卯）蘇聯在戰爭中的決定性作用。

（辰）聯系着歐洲戰場和亞洲大陸戰場的形勢，敘述太平洋戰爭局勢的扭轉。

（巳）日寇在中國大陸發動攻勢（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月）的原因及經過——着重把國民黨軍隊的空前潰退和中國人民武裝的展開局部反攻作對比。

（午）雅爾達會議的召開及其協定的內容——着重說明中蘇共同經營中國長春鐵路及共同使用旅順港的意義。

（未）美國反動份子「招降日本」的陰謀和波茨坦會議（一九四五年七月——八月）的召開及其內容，聯帶指出美帝包辦對日和約的非法。

（申）蘇聯的參加對日作戰和日本的投降——重點說明日本投降主要是由於蘇聯的參戰而不是由於美國之投擲原子彈。

3、總結：

（1）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性質——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戰一開始就帶有反法西斯戰爭，解放戰爭的性質，蘇聯加入反軸心國的戰爭是加強了這一性質（斯大林在莫斯科斯大林選區選舉前選民大會上的演說）。

（2）戰爭的結果——法西斯國家集團在軍事上被粉粹，使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兩者之間相互力量對比發生了有利於社會主義的急劇變化，具體表現在。

（子）戰前資本主義世界的六個強國中，有三個（德意日）被打垮了；有兩個（英法）被削弱了；只剩下面臨着新的經濟危機的美國，成爲世界反和平反民主陣營的反動中心；

（丑）蘇聯國際地位與威信無限重地提高，成爲世界和平民主陣營的領導力量；

（寅）東南歐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出現，特別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誕生，是歐洲歷史的轉折點；

（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新高漲，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的基本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給予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指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的道路，鼓舞其鬥爭信心，並大大增強了世界和平民主陣營的力量。

（3）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經驗教訓——

（子）第二次世界大戰證明了資本主義社會、國家制度是腐朽的，必然要死亡的；而社會主義社會、國家制度是優越的，必然能取得完全勝利的。

（丑）第二次世界大戰證明了從法西斯匪幫到各國的反動統治者，一切反人民的力量是非常脆弱的。即使在開始時，他們有的似乎非常強大，但由於他們是日趨沒落的力量，因此他們不可避免地要歸於死亡；而人民的力量則是強大無敵的，即使在開始時他還沒有被人們所體認出來，但由於他是永遠新生、有着無限發展前途的，因此他必然會充分顯露其偉大力量，最終地取得完全勝利。

（4）戰後世界人民的鬥爭方向——戰爭改變了整個世界的政治面貌，引起了政治力量的新劃分，世界形成了兩大陣營。以美帝爲首的世界反和平反民主陣營正在發動新的戰爭，因此站在以蘇聯爲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陣營中的各國人民，應該加強團結，反對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的新的戰爭發動，爭取世界持久和平；爭取民族獨立人民民主，爭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前途；爲鞏固和發展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而奮鬥！

第一次中日戰爭（一八九四——一八九五）（續）

——中國近代史講課記錄

司綏延

四　中國人民爲反投降反侵略而鬥爭

台灣人民的奮起。

台灣是祖國領土的一部分，原屬福建，稱台灣府，後設台灣道。一八八五年建立行省，改淡水廳爲台北府，是巡撫駐在之地。台灣自建省後，經營鐵路、商船、屯墾、開礦等事業，每年收入三百數十萬兩。（註二十一）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所簽訂的馬關條約，內有一欵是割讓台灣全島給日本。台灣人民聽到這一個行將變爲亡國奴的凶耗，「奔走相告，聚哭於市中，夜以繼日，哭聲達於四野，風雲變色，若無天地」。（註二十二）事實證明，滿清政府爲了維持其殘餘統治，已將台灣出賣，而台灣人民對這種投降賣國的條約，當然是堅決反抗的，所以就展開轟轟烈烈的反降投反侵略鬥爭。

可恥的台灣民主國。

台灣第一任巡撫是淮系劉銘傳，第二任是非淮系邵友濂。一八九四年十一月，邵友濂怕日本攻台灣，運動滿清政府調任湖南巡撫，繼任的是唐景崧。唐景崧在中法戰爭時，曾赴越南招募劉永福。（註二十三）戰後唐景崧投台灣道，（繼升藩司）劉永福受兩廣總督張之洞的圈套充任南澳鎮總兵。當中日時局緊張的時候，劉永福又率所部防守台灣;，仍號黑旗軍。

唐景崧的爲人剛愎自用，自以爲是，與僚屬動輒齟齬，並且「與永福共事越南後，積不相能」，（註二十四），這次升任巡撫，自率由盜匪編成的親信隊伍駐台北，把英勇善戰的黑旗軍排擠駐到台南，庫存的銀兩、火藥、毛瑟槍和砲彈一點也不分給劉永福，這已經種下後來放棄台北，孤立台南以致最後失敗的因素。

當滿清政府決心把台灣奉送給日本以後，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紳士邱逢甲等以台民名義宣佈成立台灣民主國，推唐景崧爲總統。唐景崧表面上雖然接受了這個名義，實際上是接受滿清政府的飭令掩護「大小文武各員」撤退的。事先提大批銀兩，匯往國內，把妻子和行李早已送走。五月二十七日以前，台北官吏，幾乎逃光。六月二日，李經芳在日艦上交割台灣，日寇攻陷基隆，四日唐景崧就化裝雜難民中乘英輪逃回廈門，（註二十五）狼狽已達極點。這樣日寇就不費一兵一卒的佔領了台北。

唐景崧的作風，充分暴露了封建官僚貪汙腐化和奴隸性動搖性。這一些逃官，無一不是該殺的民賊;這個「總統」，正是中國人民的叛徒，這個「台灣民主國」，也正是代表滿清的巡撫和紳士利益的，是可恥的民主國。因此，堅決反抗野蠻侵略的就只有劉永福和台灣人民了。

劉永福之所以能抵抗日寇，在於發揮了人民羣衆的力量。當時台灣人民，一方面旣切齒於唐景崧，一方面又以保家衞國爲己任。例如當時農民出身的志士徐驤，他號召大家「吾台、吾民父母之鄉也，吾民之田廬在於是，子孫在於是，祖宗丘墓在於是，台亡，吾民將安歸乎」。主張「執挺以爲劉公（永福）助」，「人自爲戰，家自爲守」，目的在於「成則建造新邦，燿燿千古，敗則舉吾民之骨血與台俱燼焉，是亦亡國之榮也」！這是何等崇高的愛國主義的精神。因此大家「願皆投身軍籍隨驤俱死」。（註二十七）於是選練壯丁，編列隊伍，號曰民團，推徐驤爲民團長。這一支農民武裝，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無比的力量。

保衛台中的英勇鬥爭——一八九五年六月——一八九五年八月。

六月二十五日、日寇攻安平口，劉永福率隊抵禦，徐驤也率民團助戰，日艦不敢近岸，雙方發砲轟擊，永福發巨砲命中日艦，日寇倉遑逃去，獲得偉大的勝利。日寇在安平口失敗，八月初，轉攻新竹，新竹守將楊紫雲，與義民抵抗日寇相持月餘，大小二十餘戰，永福並遣徐驤等率軍助戰。日寇收買漢奸從僻徑抄襲。是役紫雲英勇犧牲，雖然新竹淪陷，但斬獲甚多，予日寇以嚴重的打擊。

日寇佔新竹後，進攻大甲溪，黑旗軍吳彭年與徐驤以伏兵計突擊日寇，敵兵不戰自亂，死傷無算。

台中府在台灣中央，城外有八卦山之險，山外復有大甲溪，日寇旣決心侵佔台中，自然要以重兵進攻大甲溪。此時永福命徐驤和袁錫清居前敵，李惟義居後軍，相持一月日寇不能前進。日寇又施其故伎，收買漢奸土匪，襲擊後軍，李惟義潰退，大營失陷。前隊受此影響，袁錫清率隊全部戰死，徐

讓率民團突出重圍，退守八卦山，永福令忠滿（滿洲人）率忠靖軍四營往援，忠滿畏葸不進，以致大甲溪陷於敵手。

大甲溪既失，永福令諸軍嚴守台中府及八卦山。八月底，日軍來攻，徐驤的民團和吳彭年的黑旗軍，居高臨下，甚爲得手。有時乘夜襲擊，日寇自相踐踏，死者無算。日寇又收買漢奸土匪，昏夜伺引日寇登山，及至察覺，敵兵已佈滿山谷，徐驤和吳彭年與敵寇白刃相拼，軍士傷亡很多，彭年壯烈戰死，徐驤率餘衆且戰且退，始得脫險。

日寇既佔八卦山，由山上架砲轟城，漢奸開門迎敵，李仕高、沈仲安、楊春發等與敵寇苦戰半月之久全部殉難，台中府於二十八日淪陷。

保衛台南的英勇鬥爭——一八九五年八月——一八九五年十月。

八月二十九日日寇連陷雲林、苗栗，次日又佔領大莆林並進犯嘉義。此時劉永福又重新佈署，堅決抵抗，這種英雄的行動，許多匪首都受到感召，如黃榮邦等都變爲義軍，奮勇殺敵。以致大莆、雲林、苗栗等縣，相繼收復，並包圍台中府。在這些戰役中，日寇遭受極大打擊，以致不敢出戰。永福同時回台南佈置海防又推行聯莊法檢舉匪類，不但地方逐漸安靖，而且台中、台北的人民也聞風興起，秘密組織聯莊，準備響應，眼看台灣全局的勝利大有希望。惜黑旗軍、民團和義軍此時彈盡援絕，內外交困，與其相持待斃，不如併力前進，迫使走向與敵寇作最後一拼的道路。九月二十三日，全軍進攻台中，不克。次日黃榮邦又猛攻砲台，英勇犧牲。二十五日林義成又攻砲台受重傷。十月一日敵軍反攻蕭三發受重傷，徐驤、簡精華等奮死擊退敵軍，當時糧食匱竭，各軍死傷慘重。十月七日敵寇又反攻，各軍捋復突圍，精華、義成、徐驤都受重傷。次日又大戰：各軍戰敗，死二千人。十日，徐驤率隊衝鋒，各軍奮勇作戰，敵軍退卻。不幸徐驤中砲壯烈殉國，各軍潰敗。雲林、苗栗兩縣又陷敵手。台灣的黑旗軍、民團和義軍就這樣與敵寇作頑强不屈的鬥爭，直至流盡最後一滴血而後已，充分發揮了的愛國主義的精神，永遠爲中國人民所崇敬。

台中正在苦戰，敵海軍又進犯台南，十月五日敵分五路砲擊，永福巡視督戰。十一日，敵攻嘉義縣，王德標定計用地雷炸死敵寇七百餘人，又用伏兵殺敵無算。十二日敵大舉攻城，王德標奮身戰死，嘉義縣淪於敵手。台南更危急難守。

由十月十三日到十八日敵連日進犯台南，永福親自發砲應戰，各軍餓到不能應戰的程度，最後土匪奪城，迎接日軍，十九日劉永福才不得已乘英船德利士號回國。

黑旗軍、民團、義軍失敗的原因。

黑旗軍、民團和義軍爲反投降反侵略而戰，爲保衛人民反對黑暗的統治和奴役壓迫而戰，是一種正義的戰爭。這種正義戰爭爲什麼失敗呢？第一，內地大小官吏，對台灣竭澤而漁，貪贓枉法，黑暗無比。淮系與非淮系又彼此發生排擠。這樣造成了嚴重民族的、官民的、官兵的矛盾。第二台灣民主國成立後，不但把希望寄託在滿清政府和列强各國的身上！並且布告說：「民閒有假立名號，聚衆滋事，藉端仇殺者，照匪類治罪」，這就是鎮壓人民力量的藉口。第三李鴻章早就下決心放棄台灣，奉送日本，視台灣人民如寇仇。人民反對作亡國奴，他說是「台灣人民，如此兇橫」。（註二十八）他看見台灣人民力量强大，請「日本遣派水陸各軍，以資彈壓，保守平安」（註二十九）這是他一向站在敵人的立場辦外交一貫表現。第四中國人民在內外惡勢力的鎮壓下，掀起偉大壯闊的反侵略鬥爭，是李鴻章等十分忌恨的，曾百般加以破壞，對台南加以封鎖，絕斷接濟，李鴻章和滿清政府嚴令官民「不得絲毫接濟台南」，劉永福曾再四派員到內地呼籲，邊寶泉、譚鍾麟、李秉衡、劉坤一、王文韶、翁同龢、張之洞等當然與李鴻章站在一邊的，不但毫無收獲，張之洞還說：「倭有東南督撫暗中助逆之說，言於我政府，關係外交不能爲力。」（註三十）以支援人民爲助逆，可見與侵略者的立場是一致的。張之洞等在中法、中日戰爭中，也曾表示過强硬，至此原形畢露。第五，日寇收買漢奸作嚮導內應，助敵作亂。第六，外國銀行，奸商乘機援亂金融，停止交易，居心破壞，以致抗日軍不能支持。

劉永福在中法中日戰爭中，是一個堅決抵抗侵略者的民族英雄，高度的表現了愛國主義精神，是值得表揚的。不過，爲個人利益打算，安於小就，一次又一次地墮入反動統治者的圈套（註三十一）是應該加以批判的。

台灣人民爲最後解放而英勇鬥爭。

這一頁可歌可泣的抗日鬥爭史，雖然失敗，但台灣人民是不甘心作亡國奴的，五十年來，進行了英勇的反帝鬥爭，例如一八九五年的林大北，一八九六年的劉德杓，一九〇一年的詹阿瑞，一九〇七年的蔡清琳，一九一二年的黃朝、陳阿榮、羅福星、一九一三年的張火爐，一九一四年的羅阿頭、羅俊、余清芳……（註三十二）前仆前繼，再接再厲。由此證明，台灣人民，深深地體會到「邊疆是祖國的邊疆，海洋是祖國的海洋」，現在正爲台灣徹底的解放而堅決鬥爭，最後的勝利，當不在遠。

五　戰後遠東的新形勢與中國人民的覺醒

三國干涉「歸還」遼東半島

日本戰勝中國和馬關條約的締結，因爲有美國的幫兇予日本以莫大的便利。帝俄因日本取得出乎意料之外的勝利，尤其是佔領朝鮮和遼東，在大陸上獲得領土，利害矛盾，引起極大的不安。俄、法同盟，法國助俄對日，是自然的結果。德國自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後，工業突飛猛進，資本主義的發展已有後來居上之勢，急須插足侵略中國，在遠東謀一煤站。因此也積極參加行動。這就俄德法三國暫時勾結起來，干涉還遼的基本原因。英國在戰爭中「傾陰袒日」，可是也不願日本勢力過分强大，同時另有一套侵略中國的計劃，這就是在遠東

問題上，雖然「英俄相忌」，可是對於干涉還遼，表示「中立」態度的基本原因。

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即馬關條約簽字的後六天，三國駐日公使同時向日本外務省「勸告日本政府，應放棄領有遼東半島」，日本感覺一切「甚無把握」（註十三），五月十日宣告容納友邦（三國）之忠言」，幾經交涉，終於十月十九日日本正式承認三國歸還遼東半島給中國的宣言，中國出贖遼費三千萬兩。

從此東北成爲帝俄日本矛盾的焦點，也就是國際資本主義在東北矛盾的焦點。

由大量賠款而大量借款。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後，世界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已逐漸地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因此中日戰後帝國主義金融資本對中國的經濟侵略開始了新的方式——政治借欵。其基本目的在於把「過剩」的資本輸出到半殖民地的中國，以奴役剝削中國勞動人民，獲得超額利潤。

馬關條約第四欵規定賠償日本軍費二萬萬兩，分八次交清，爲期七年，如三年內還清，可全數免息，否則自第一期付清計算加年息百分之五。滿清政府爲了節省利息，必須三年內籌足全數。可是一八九四年滿清政府全年收入尚不足八千九百萬兩，戰後財政本已十分困難，現在急於交付賠欵，只有向帝國主義們大量借債。根據上述條約，第一年須付欵一萬萬兩，再加贖遼費三千萬兩共一萬萬三千萬兩，因此大量借債更是迫不及待。

滿清政府急於借債，帝國主義者們也急於放債，由於統治階級有派系，帝國主義之間也有矛盾，所以不斷的爭吵，因而也不斷相互勾結，終於一八九五年七月六日簽訂俄法洋欵合同，數目四萬萬法郎，年息四厘，以海關收入担保，三十六年還清。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簽訂英德洋款合同，數目一千六百萬英鎊，年息五厘，以海關收入爲担保，三十六年還清。一八九八年三月一日簽訂續英德洋欵合同，數目一千六百萬鎊，以海關收入，厘金，鹽厘爲担保，四十五年還清。（註三十四）

以上三次大借欵，共計合銀三萬萬兩，加上利息共六萬萬兩以上。這是多麼驚人的數目，吸吮着中國勞動人民的膏血，並且通過此種龐大的外債，攘奪中國的政治經濟大權。

這些外債之中的俄法借欵，根據合同到一九三一年才能還完，可是蘇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後，便向中國人民宣佈以前帝俄時代的一切借欵和賠欵全部取消，這種偉大崇高的國際主義精神和誠摯的友誼，是十分值得紀念和感謝的。

由大量借款而劃分勢力範圍

帝俄發動三國干涉還遼，引起統治階級親俄派的極大衝動，以爲如有「俄人之助」，可以高枕無憂。帝俄慣於向中國索取報酬，這次當然更不能錯過機會。一八九六年五月，俄皇尼古拉二世舉行加冕典禮，賣國賊李鴻章就利用這個機會來完成賣國任務，帝俄更歡迎他完成這個任務，變方玩弄極端卑汚的手段，李鴻章獲得「欽差頭等出使大臣」的名義之出發，帝俄馬上就迎頭趕上迎接。結果締結「中俄密約」。許可帝俄兵艦駛入中國所有口岸，建築中東鐵路，首先確定東北爲帝俄勢力範圍。

列强在中日戰爭前後，旣已過渡到帝國主義階段，對中國要求投資，是當然的結果，於是以三次政治性的大借欵爲契機，帝國主義的要求一齊發作起來，要投資必須劃分勢力範圍，以便進行「瓜分」中國。

帝國主義所有的要求，滿清政府都一一承認，結果各劃勢力範圍；長城以北屬俄，長江流域屬英，山東屬德，雲南兩廣屬法（一部分屬英），福建屬日。

在劃分勢力範圍的同時，帝國主義又爭奪中國鐵路的建築權，英得二千八百哩，俄得一千五百三十哩，德得七百二十哩，比得六百五十哩，法得四百二十哩，美得三百哩。

「建築鐵路，看來似乎是一種簡單的……在事實上，資本主義的密網，却千絲萬縷地把這種事業與一般生產資料私有制聯繫起來，把這種建築事業變成用來壓迫依賴國裏十萬萬民衆（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共佔世界人口半數以上）和壓迫『文明』國裏資本僱傭奴隸的工具」。（註三十五）這樣「逐漸瓜分大清帝國」的形勢，已經造成了。

美帝提出第一次「門戶開放」政策。

中日戰爭以後，列强都想「瓜分」中國，到一八九八年已相繼劃分「勢力範圍」，就在這個時代，美國已步入帝國主義階段。美西戰爭（一八九八年）說明美國正如其他帝國主義一樣對重新分割世界有着强烈的慾望。美國佔領非律賓，其眞正目的是企圖進一步侵略中國，事實上此時中國沿海區域已被列强分割淨盡，要想從中國取得「勢力範圍」，可能性已經很小，乃採用英人希貝斯萊的建議由國務卿海約翰的一八九九年九月向英、法、德、俄、意、日六國提出所謂「門戶開放」政策。

「門戶開放」政策的要點：第一各國在中國任何所謂「勢力範圍」內所取得的一切特權，彼此互不干涉。第二各國「勢力範圍」內的各港口，無論任何國家入港商品，皆遵中國現行海關稅率納稅。第三各國「勢力範圍」內之各港，對於各國船，不課本國船以上的入港稅，各國「勢力範圍」的鐵道，對於他國貨物，不深課本國以上的運費。（註三十六）

「門戶開放」政策，是美國從望厦條約一貫侵略中國的繼續並加緊，把「利益均霑」的侵略政策更加擴大和深入。這一個政策的澈底實現，等於打破一切限制，把中國全部領土一律「開放」，變中國爲殖民地。「門戶開放」政策，從本質上來看，正是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同盟。這一種侵略同盟與資產階級對外侵略「自由放任」的理論是一件東西，是國際資本主義侵略殖民地的一種方式。最初從要求某一地的利益均霑開始，但最後則是在於獨佔和壟斷這個殖民地的一切利益。史實證明，非洲剛果在成爲比國獨佔殖民地以前，亞洲印度在成爲英國獨佔殖民地以前，非律賓在成爲美國獨佔殖民地

以前，都是如此。這就是美國對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一方面澈底暴露他的陰謀詭計和猙獰的侵略眞面目；一方面還可以說明列强所以不反對，相反的還表示同意和支持的基本原因。

中日戰後，英國對遠東政策，有了新的變化。由於日俄的矛盾，一變過去的聯華制俄而爲聯日制俄，加强了英日的勾結，爲後來英日同盟和日俄戰爭的張本。

中國人民的覺醒。

中日戰後，國內起了很大的變化，中國人民一方面既憤慨於滿清統治階級的投降賣國；一方面又因爲外交失敗的刺激，反帝的情緒，日益高漲。這就不能不促進中國人民的覺悟，推動中國人民迫切的要求改變現狀。在這種基礎上再加以國內各階層成分的不同，所以要求也隨着有差別，因此在中日戰爭前後，中國人民這種偉大潛在的力量，將這種不同的要求反映成爲孫中山領導興中會的革命、康有爲等領導的改良主義運動和義和團的農民反帝暴動，中國近代史又向前推進一步。

六 簡短的結論

中日戰爭的意義和性質。

第一次中日戰爭，亦名甲午戰爭，又名中東戰爭。這一次戰爭，在中國近代史上與前三次的對外戰爭，大不相同了。在第一、二次鴉片戰爭與中法戰爭，中國結果是「失敗」了，但當時英法兩國，是西方的頭等的「强國」。而這一次戰爭的對手，是東方的後起的蕞爾小國。並且這次的失敗，比較更慘，損失更大，因此更十足的證明了滿清政府之無能，每況愈下。也宣告了李鴻章等洋務運動澈底的破產。

日本之所以發動戰爭，基本原因在於「明治維新」後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日本的統治階級爲了擴大剝削與擴大侵略範圍，才發動以奴役朝鮮人民和侵略中國爲目的的戰爭，完全是掠奪性的戰爭，是非正義的戰爭。

中日戰爭的影響。

中日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劃時期的戰爭，馬關條約是劃時期的條約，對各方面的影響，是非常重大的。就中國說：由於戰爭的失敗，不但藩屬完全喪失，而且本土也遭到損失，列强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施行門戶開放政策，闢租借，開工廠，建鐵路，採礦、投資，廣大人民的痛苦日益加深，民族經濟更遭到摧殘破壞，完全確定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慘地位，因此中國人民的求生存求解放的鬥爭，也就向前發展一步。就日本說：在這一次侵略戰爭中，對中朝人民的屠殺搶掠，是非常殘暴的，例如攻佔旅順就清洗四日，結果全市僅剩三十六人。（註三十七）美國雖然幫助日本，也不得不承認日本是「蒙文明皮膚具野蠻筋骨之怪獸」。即此可見一斑。由於這次的「戰勝」，一方面得巨額的賠款，得大量的物資，一方面在中國取得一切特權，就迅速的向帝國主義的道路發展，一九〇〇年參加八國聯軍，一九〇五年進行日俄戰爭，一九〇六年滅朝鮮，一九一五年向袁世凱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一九二七年更提出呑併中國侵略全世界的所謂「田中奏摺」，以致發動九一八事變和七七事變，到一九四五年才失敗。中日戰爭，由於滿清統治階級，犧牲中國人民的利益，放縱日本的侵略主義，使其侵略野心和野蠻獸行肆無忌憚的擴張，五十年來蹂躪中國半壁河山，屠殺中國同胞何止數千萬。生命財產的損失，難以數計，影響是如何的重大！因此我們對日本的軍國主義具有無限的憤恨，同時對統治階級的賣國投降，更具有無限的憤恨。

中日戰爭的經驗教訓。

這次戰爭中國所以失敗的基本原因和決定條件，既不在於中國的艦砲武裝較劣於日本，也不在於日本有不得了的本領，更不在於美國從旁慫恿和幫兇，而在於有與人民利害矛盾滿清政府和封建軍閥存在。因爲有他們存在，不但不可能發動人民進行民族的自衛戰爭，反而對人民的力量具有無限的仇恨，以致雖然是正義的戰爭也不能繼續，國際和國內雖有可利用的機會，也不顧一切的放棄。因此證明只有與人民利益一致的政府和領導，才能發揮中華民族潛在的偉大的力量，取得最後反侵略的勝利。

歷史證明，日本的野蠻侵略，中國人民是可以戰勝的。現在日本反動頭子曾經參加「田中奏摺」起草的吉田茂，曾經幫助日本侵略朝鮮和中國的美帝國主義，還夢想走當年的老路子，在中朝人民的面前，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一定要變爲齏粉。

這就是第一次中日戰爭的基本經驗教訓。

註二十一：羅惇曧：割台記，又范文瀾：中國近代史。
註二十二：江山淵：邱逢甲傳。
註二十三：唐景崧：請纓日記。
註二十四：羅香林：劉永福歷史草文，羅惇曧割台記。
註二十五：割台記。
註二十六：江山淵：徐驤傳。

註二十七：同上。
註二十八：李鴻章給李經芳電。
註二十九：李鴻章致伊藤電。
註三十：劉永福歷史草。
註三十一：范文瀾：中國近代史。
註三十二：彭子明：台灣近代史。

註三十三：陸奧宗光：蹇蹇錄。
註三十四：孫毓棠：中日戰爭賠款的借款。
註三十五：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註三十六：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
註三十七：胡麟德：中日戰爭之國際公法。

史料拾零

陳毓羆

張杓的上祁宮保書

「用兵之策，不外攻守兩端。不能攻而徒議守，非策也。守不於遠而於近，亦非策也。今有賊欲犯吾廬，不於里門禦之，亦於家門禦之，豈有聚百十人於室中守臥榻者乎？」

——陳澧撰張杓傳所引上祁宮保書

「……貧民竭肩背之力，僅給饔飧。縱享壽百年，無銖黍之積，遺於妻子。誠能使陣亡者得二佰金卹其家屬，是生而困者死而亨，將有樂死惡生捐軀恐後者。東山詩序曰：君子之於人，叙其情而憫其勞，所以悅也。易曰：悅以先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其是之謂乎。至若軍務所需，火藥爲重。石子頭以上各村，距省路程遠者百里，近亦四五十里，往返動需時日。石岐營有火藥局焉，請撥精良者廣儲之，三四日間從而接續之。俾鄉民便於取携，不致臨時告匱。併請擇端正廉潔具有天良者，或官或士，坐鎭於該鄉社學中。凡陣亡受傷者，尅敵告捷者，察其眞僞，覈其多寡，支領火藥及犒卹銀兩，稽其出入之數。則下無浮昌之弊，上無剝蝕之虞，賞罸嚴明，防範周密，士尙有不用命者歟，吾不信也。幸虛懷而採納之。

抑杓更有請者，邊釁之開，造端吾粵，繼乃株連於浙，今復波及於閩。深九重宵旰之憂，貽百姓流離之苦，心切痛焉。縱謂兵革不能往救，亦當設法以解其圍。今請宮保俯照前書所言，即日備辦船隻，頒發口糧銃礮火藥器械。傳諭各鄉，限三日內各成壁壘，部署整嚴。一面號召虎門內外各鄉，集敢死士萬餘，坐駕石船，堵截於沙角外。鄉民於沙角內修築礮台。逆夷聞之，當回帆指粵。我兵激於忠義，一鼓作氣，必奏膚功。且彼勢既分，即可紓廈門之急，地方官得以從容克服，不致嫁禍於鄰封。杓淺人也，心有所見，口輒宣之。宮保以爲賈山之至言耶，杜牧之罪言耶？」

——上祁宮保書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間，英帝國主義的侵略軍受到廣東民衆的沉重打擊，就狼狽地退出了虎門。七月初，璞鼎查率大軍突襲廈門，閩浙總督顏伯濤急調水陸軍守鼓浪嶼，戰鬥相當激烈。張杓的後一篇上祁宮保書就是在這時候寫的。他主張廣東方面發動民衆對英軍實行總攻擊，以分散福建方面所受到的壓力。可是，反動的賣國官僚並未採納他的建議，坐視鼓浪嶼和廈門相繼失守，以致英軍乘勢在八月間攻陷定海，進而窺逼長江了。

張杓號磬泉，嘉慶舉人，掌教香山欖山書院及南雄道南書院。據本傳的紀載：「每日坐講堂講經史，來學者衆，書院不能容、多於書院外賃屋居焉。敗夫牧豎過院門，輒駐足聽之，稱爲講書老師」，可見他是當時很有名的一位學者。

他是一個堅决的主戰派，「凡四上楊芳書，六上祁墳書，皆口授滔滔不絕，繕寫者筆爲之倦」。由於三元里事件的敎訓，他認爲對付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唯一辦法，只有狠狠的打，痛痛的打；而且必須發動廣大的民衆，供給他們的武器，撫卹他們的傷亡。

「手示祗悉。尊意主於守，鄙意主於攻。守與攻，皆以得人爲貴。擁兵十餘萬，任夷人登陸，焚燒刼掠而莫敢呵。義民一舉，即戮其梟帥，斬級百餘。若非首府乞憐逆夷，將聚而殲旃，不止獻義律之馘。此攻貴得人之證也。填河之役，盧敏悋創之，林督琦督踵而行之，功蓋密矣；琶洲赤岡一帶且有兵衛，然木樁石礎，夷人舉之若舉莛焉，無撓之者。三山水口，不勞關鎖，夷人三次攻擊，皆不能入。此守貴得人之證也。今日之局，將帥不足倚，兵士不足憑，攻守無人，自當團練鄉民爲要……」（與曾勉士書）

而對著窮兇極惡的英帝國主義者日益擴大其侵略，長江不守，鎭江陷落，南京也廹危急，張杓和新甯縣學的學生作了一次慷慨激昂的講演，嚴格的要求知識份子以實際行動愛國。後來更把這段演說辭錄在「重修新甯縣學記」中。

「遇有倉促，則忠信爲甲胄，仁義爲干櫓，仗一往無前之氣，父率其子，兄率其弟，聲響相應，衆志成城，于以同讎，于以敵愾。禮所謂無事則用之於禮義，有事則用之於戰勝者也。詩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於征

，狄口東南。允文允武之材，非諸君子其誰屬哉？」

「若徒以誦讀爲功，吟咏爲能，視勇敢爲歧趨，等家國於異路。地方有急，非畏葸卽矜張，甚且假公濟私，釣名而射利，是豈學中人乎？」

以上諸文槪見學海堂叢刻第九種：磨甋齋文存。

孫鼎臣的官兵行

海口不靖以來，定海寧波婦女被毒最殘，有帶至鬼國者，有鬻與他人者，有肆淫後投之於水者，有送與漢奸者，陳少香先生詩所以有「紅粉千行航海去，白旛一片上城來」之句。然各海口官兵之害，猶之逆夷。余友孫芝房太史「官兵行」云：

北風蕭蕭腥滿衢，廣州城中人迹無。
家家閉戶如避逋，官兵橫行來叫呼。
官兵殺人食人肉，挺刃莫敢相枝梧。
短領窄袖大布襦，三三五五偏里閭。
宰割雞犬牛羊豬，突入酒肆懸雙弧。
搜索盆盎及罌盂，飲食醉飽惟所須。
八十老翁泣路隅：
「去年夷人到番禺，十家五家被賊俘。
今年官兵望討賊，賊未及討民被屠。
彼賊殺人兵得誅，官兵殺人胡爲乎？」
黃昏吹角聲嗚嗚，轅門半掩人吏疏。
雙雙銀燭紅氍毹，大將夜坐治軍書。
老翁欲歸無室廬，夜半却立長欷歔。

——林昌彝：射鷹樓詩話卷二

這首詩描述了道光二十二年間廣州的慘狀。反動的滿淸政府對外堅持投降政策，對內則屠殺人民。廣大的民衆在飽受英帝國主義的蹂躪後，又遭到了統治階級軍隊的摧殘。在他們的眼底，所謂「官軍」實在和洋兵並沒有什麼區別。

編後記

本刊自本期起，已是第二年的開始。在第一卷的編輯過程中，我們努力於（一）多刊載學習中國近代史的稿件（二）添置近代史講課紀錄欄（三）開闢「問題解答欄」（四）加強校對工作。結果雖然都是做了一些，但仍是不够的。今後準備在這幾方面，再加努力，並計劃着重多刊教學方面的文章，俾對中小學教師有所幫助。

一年來本刊是在作者和讀者以及各方面的支持、協助下成長的。這一階段的工作經驗，使本社同志感覺到編輯責任的艱巨；尤其是在要求出版質量逐步提高的號召下，更使本刊同志感到了力量的不够。因此除了本刊編輯同志努力提高政治認識及編輯方法外，今後更希望作者讀者以及各方面隨時提出改進本刊工作的意見，俾使本刊得以日漸提高。

× × × × × ×

因爲本刊編輯力量的有限，在去年一年中與作者讀者的聯系以及退稿工作，做的都很差。我們已感到這是必須提早改善的。現在本刊正在約聘專搞通聯的同志，加強對作者和讀者的聯系。同樣是因爲這種緣故，我們對各地的交換關係，也不正常，這一問題將和加強與讀者作者的聯系一並解決。但在這裏我們希望各方面諒解我們以前的困難。

× × × × × ×

本社出版的「歷史教學叢刊」僅刊印了三種，遂因經濟力量的限制而暫停。在今年這種限制已經可以克服了，所以今後我們決定根據讀者的需要繼續編印叢刊單行本。不過我們的計劃仍是以稿件質量爲第一，所以寧可少出一些。

× × × × × ×

本期採用何遠同志的「人民歷史教師對教育的基本認識」，是討論中小學歷史教學法的試探，以後將陸續刊載，以供讀者參考。

× × × × × ×

本期出版正值一九五二年元旦，本社同志敬祝讀者作者新年進步。

本期零售每冊二千八百元

天津市軍管會登記證新字第五十號
天津郵政管理局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登記證第四十六號